

红旗

HONGQI

17-18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七、十八期合刊 ★

目 录

- 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安子文 (1)
- 通讯: 评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张启勋 (14)
- 周谷城是怎样袒护秦檜、贊成投降、
 詆毀主战派的.....金应熙 (21)
- 学习列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
 ——讀《国家与革命》的体会.....黄宗汉 (25)
- 从实践中提出学习課題徐非光 (35)
- 反面教材不可不讀陈展超 (37)
- 評介三本經濟史料书..... (40)
- 从启新洋灰公司看民族工业的命运王 城 (41)
- 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沙为众 (44)
- 私营商业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調查徐道河 (47)
- 实用主义經驗論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汝 信 (50)

☆ 九月二十三日出版 ☆



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

安子文

一、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伟大意义

最近期间，各级党委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关键时刻，都曾经着重地提出过造就新干部、培养新干部的问题。过去，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我们党在干部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现在，毛泽东同志又向全党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较之过去，具有更加伟大的战略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又红又专的新人材。这是很清楚的。老的革命者总是要交班的，需要有革命的接班人。这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仅仅从一般意义上来认识这个问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确保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联系起来，才能深刻地认识它的重大意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由于在接班人上出了问题，使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者手中，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遭到挫折，这样的教训是不少的。其中，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出了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一次是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两次，危害最大，教训最深。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欧洲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派别，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蒲鲁东派和巴枯宁派，在工人中的影响，要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得多。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才赢得了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分子的拥护。当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以后，资产阶级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者被迫意识到，要公开打起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



义，已经很困难了。列宁指出：“过去，欧美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总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公开的直接的原则斗争，而现在却往往主张用所谓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①这就是说，露骨地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在工人阶级中的市场已经缩小了。因此，资产阶级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改变斗争策略，转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形式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觉察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已经露出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苗头，并且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能不有所顾忌，一般地说，他们的活动是比较隐蔽的。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负起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使运动继续前进。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党的著名领袖伯恩斯坦，便公然打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随后，德国党的另一个著名领袖考茨基，也转上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某些领导人，没有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没有对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展开斗争。他们对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阴谋完全失去了警惕性。加之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正处在和平发展时期，盲目崇拜合法运动、迷信议会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正在党内泛滥。所以，恩格斯逝世以后不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就不仅篡夺了德国党的领导权，而且还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缔造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望，把持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机构，大力推行同资产阶级合作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帝国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化、革命形势大好的紧要关头，他们完全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国主义的压力，出卖和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发动世界大战的帮凶。结果，第二国际完全破产，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也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淘汰了。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彻底粉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这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妄图利用列宁逝世的机会，用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及时地识破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观点，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捍卫了列宁主义，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继续掌握在忠于列宁事业的布尔什维克手里。由于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

^①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2页。



争取得巨大的胜利，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公开的阶级斗争转为曲折隐蔽的形式了。同这种变化相适应，党内的修正主义者，也不再采取托洛茨基、布哈林在党内建立反对派、公开反对党中央的办法了。他们装成忠实的布尔什维克的样子，口头上表示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任，长期潜伏在党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由这样一小撮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组成的。他们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就一步一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一方面肆无忌惮地践踏列宁和斯大林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篡改列宁的革命学说，力图改变苏联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又利用伟大列宁和伟大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不择手段地在国际上兜售共修正主义路线，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就使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在世界革命运动内部起了极其恶劣的破坏作用，给帝国主义帮了大忙。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次大反复表明，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政党也是一分为二。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就一定会有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修正主义的派别；有修正主义的政党，也一定会有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总是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由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掌握革命领导权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阴谋篡夺领导权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自从世界上有了无产阶级政党以来就是这样。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必然反映。

任何时候，像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总是极少数。要革命的人，总是多数。那些极少数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之所以能够得势，就是因为利用多数人对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面目辨别不清，对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丧失了警惕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次大反复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善于识别哪些人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哪些人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特别慎重地挑选和培养革命接班人，把领导革命的责任交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防止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篡夺领导权。要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不容易的。把人看错了，是常有的事。一旦把暗藏的敌人揭露出来，许多人由于平时毫无察觉而感到十分突然，也是常有的事。接受这些教训，不仅领导上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更重要的是要对广大党员、广大干部进行教育，使大家具有这种警惕性，具有识别和抵制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及一切暗藏敌人的力量。形成了这样一种广泛的力量，才有可能使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藏身之地；即使能够暂时隐蔽，一旦露出头来，就会被大家识破，并遭到抵制。如果



对于各种各样的敌人不加警惕，不以极大的努力来培养革命接班人，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专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会瓦解变质，资本主义就会复辟。这样，历史就会大倒退，革命就得重来。

半个世纪以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这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列宁曾经明确地指出，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修正主义是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呢？不，它同样是有阶级根源的。铁托修正主义集团的出现，特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论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论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时，都必须同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

今天，我们正处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敌人，无时无刻不在阴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帝国主义除了采用暴力手段以外，还实行“和平演变”的办法，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进行渗透，企图腐蚀和溶化我国国内某些不坚定的分子。现代修正主义者也企图用修正主义思想来败坏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为了达到复辟的目的，国内的阶级敌人，改头换面，混进共产党内，混进国家机关，搞反革命的两面手法，运用合法手段，同我们进行斗争。人们记得，一九二一年，俄国白卫分子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反革命暴乱时，曾经提出一个阴险的口号：“拥护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他们挂着“拥护苏维埃”的招牌，只是不要共产党，这在一部分人中间是会产生欺骗作用的。现在，阶级敌人更进一步了，他们不仅“拥护苏维埃”，而且也“要共产党”。他们企图戴上共产党员的帽子，挂起人民政府的招牌，篡夺某些单位的党政大权，实行反革命的政策，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这种手段，较之俄国白卫分子的手段，更加阴险毒辣，欺骗作用更大。

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一切野心家篡夺领导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青年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缺乏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欺骗青年，讨好青年，在青年中散布资产阶级影响，把一部分青年拉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了达到复辟的目的，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敌人，也特别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年青一代的蜕化变质上面。这一点，他们是并不隐瞒的。

国内的阶级敌人看到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就认为自己也出头有日了。他们根据历史发展中的暂时逆流来替中国算命，说什么“穷则变，变则富，富则修。”他们说：“掌握了青年，就可以夺回江山。”他们一方面对他们的子女灌输反动思想，要他们的子女继承资本主义、封建



主义的衣鉢；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腐蝕和毒害我們的革命干部和广大青年，力图挖社会主义的牆脚，栽修正主义的根子。一句話，他們在和我們爭奪接班人的斗争中，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国外的階級敌人也在打同样的算盘。他們很懂得，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当代的久經考驗的革命者身上是注定要落空的，于是，便想在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找出路。臭名远揚的杜勒斯說，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是可能的，“从几百年来說那是絕對肯定的。这大概是几十年的事”^①。美帝国主义的謀士李普曼也說：“瞻望将来，我們在模糊的远景中可能看出什么东西？我們可能看到共产党中国最終（在十年或二十年内）演变成为类似今天的俄国的国家”^②。

国内外的階級敌人說的和做的已經是这样的明明白白，我們的接班人問題，正是他們注意的一个焦点。

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修正主义的教訓，就好办了。看到国内外的敌人在打什么主意，就好办了。我們就可以采取正确的措施。

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分析和总结了历史的教訓，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外階級斗争的形势，在提出了正确的路綫和政策的同时，十分尖銳地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問題，指导我們在新的階級斗争的条件下提高警惕，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好革命接班人，保证永远革命下去，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建設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也是一項长期的任务。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夺取政权是有可能通过一代革命者的努力来实现的；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就非通过許多代革命者的坚持不懈的奋斗不可。在培养接班人的問題上，必須高瞻远瞩，起碼要看五代、十代。培养接班人是千年万代的大事，最要紧的，是要在社会主义时期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革命走回头路。把革命接班人培养好，是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重要的組織保证。

二、革命接班人必須具备的条件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須具备哪些条件呢？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們必須：第一，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絕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

^① 杜勒斯 1958 年 10 月 28 日在記者招待会上的談話。

^② 李普曼 1964 年 4 月 10 日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发表的文章。



者。第三，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第四，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五个条件，是选拔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马克思主义标准。它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出发来制定的，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各个不同的革命阶段，这些条件又同当时的革命任务相适应，而具有不同的具体的内容。

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考察干部，主要是通过他在这些革命斗争中的觉悟和表现。在社会主义时期，考察干部，则必须看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什么态度。要看他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是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那一边；是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还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一个人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即使他的资格再老，党龄再长，功劳再大也不行。有的干部，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在当时是一个好干部。但是，到了新的革命阶段，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又缺乏继续改造自己的自觉性，因而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了。这样的干部，如果不加强思想改造，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就不能再称为好干部，就不能成为好的接班人。

在当前革命阶段上，应当怎样理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呢？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言行一致，不仅在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在四十多年中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继续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传下去，一直传给子孙万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接过来。只有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好干部，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种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例如，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实际上却不对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甚至宣扬阶级调和论；口头上拥护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却支持一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口头上拥护革命的辩证法，实际上宣传“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口头上拥护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实际上却在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公子小姐涂脂抹粉；口头上拥护历史唯物论，实际上拒绝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等等，诸如此类的人，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全心全意地为本国的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一切劳动人民。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和从事一切斗争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为大多数人服务，就是站在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这一边，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这一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且积极支援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我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的干部只有坚决搞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地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口头上承认社会主义，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不支持群众搞社会主义，就不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而是站在少数人一边，像赫鲁晓夫那样站在百分之几的人一边。有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触犯了他们的剥削阶级家庭利益，或者他的亲戚朋友的利益时，他就袒护剥削阶级家庭，包庇亲朋好友，这个时候，在这种问题上，实际上他就站到反对社会主义的少数人一边去了。有的干部，自认为对社会主义是忠实的，但是，当自己所领导的干部，自己所信任、所熟悉的人，不搞社会主义时，不但不划清界限，坚决同这些人作斗争，而且找出各种理由来原谅他们，迁就他们。这样的干部，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站到反对社会主义的少数人一边去了。还有个别的人，因为自己的部下干的反社会主义的事情和自己有牵连，不但不正视自己的错误，反而包庇犯了错误的部下，怂恿他们，甚至同他们合伙去干破坏社会主义的事情。这样的人，就完全走上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只有

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搞社会主义，都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站在大多数人一边的人，才能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种忘掉了阶级，忘掉了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忘掉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忘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忘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只图个人私利，为一小撮人效劳的人，肯定不能做革命接班人。

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是团结绝大多数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和建设，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要搞好革命，搞好建设，就必须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团结是有原则的，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在社会主义时期，搞社会主义是我们团结的最高准则。凡是搞社会主义的同志，即使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同自己的看法有分歧，或者他存在某些缺点甚至犯了错误，也应当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他认真地团结起来。凡是不搞社会主义的人，不管他是自己的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也好，是过去最得



力的干部也好，都必须严肃地同他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只有他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才能同他讲团结。如果在搞社会主义还是不搞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不分是非，空讲团结，那就是无原则的团结。至于对极少数的反党阴谋家、混到党内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则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定要正确地地区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只要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了，我们就有了力量，就有了巩固的阵地，我们的党和革命的事业就一定更加兴旺发达。不论出了什么牛鬼蛇神，不论情况如何危急，我们都能够应付裕如。不懂得团结绝大多数人，不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坚持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发扬党内和党外的民主，把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保证。如果不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走群众路线，下情就不能上达，正确的意见就反映不到领导机关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不应有的抑制；领导机关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甚至受到品质不好的干部的蒙蔽，以假为真，就不能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还可能被阶级敌人钻空子，受他们的欺骗，上他们的当，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损害。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有民主作风，要让大家讲话，让不同的意见都讲出来，然后同大家商量。要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呼声、要求，经过分析，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只要真正能够把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发挥出来，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不能靠官僚主义，只能靠民主作风，不能靠独断专行，只能靠群众路线，不能靠压服，只能讲道理。大家决定的事，也可能有错误，那不怕，大家一起吸取教训，一起改，就比较容易纠正错误。讲民主，讲道理，讲群众路线，在这个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正确的领导，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形成的一个好传统。过去，我们坚持这个传统，保证了革命的胜利。现在，当我们已经取得了政权，建立了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必须时刻警惕，决不要丢掉这个传统，而应当使这个传统为一代一代的接班人懂得，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压制民主，蛮不讲理，独断专行的人，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有没有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当我们党已经处于执政党地位，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以后，我们



的党员和干部更加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凡是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行，不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行，不论多少大小，都是错误的，都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要下决心改正。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就应当诚恳接受。有的同志，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看不到别人和别的地区、别的单位的长处，看不到自己和本地区、本单位的短处，缺乏一种虚心向先进学习的精神。有的同志，听到人家讲自己的成绩，就兴高采烈，听到人家讲自己的缺点，就很不高兴，听不进去，甚至用种种“理由”为自己的缺点辩护，或者吹毛求疵地对待人家的正确意见，拒不接受批评。所有这些，都会严重地损害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只有经常地检查工作，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勇于改正缺点和错误，才能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才能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使小错误不致铸成大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者能够彻底做到，修正主义者是根本做不到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能够走在群众的前头，永远做革命的促进派；而修正主义者则必不可免地要被自己的错误所埋葬，为群众所抛弃。由于缺乏经验而犯错误，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由于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而坚持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革命的接班人，必须具有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才能像老的革命者那样逐渐地积累起丰富的经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没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人，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只要我们坚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准来挑选和培养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一定能够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即使在革命发展的中途出现某些曲折，甚至在某些环节上出了修正主义者，只要广大的革命接班人具备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条件，也一定能够顶得住任何风浪，胜利地粉碎修正主义者的阴谋。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条件，为广大干部的革命化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为党的干部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是革命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当然也是现在的当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够更好地熟悉业务，掌握技术，学会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本领，才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够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条件，必须认真地进行学习、讨论，广泛深入地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一定要按照这些条件来观察干部，教育干部，培养和挑选各级领导岗位上的接班人。一定要使广大的干部、党员和一切有志于革命的人，自觉地按照这些条件来要求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一定要使党内外



的广大群众懂得这些条件，并且按照这些条件来推举和监督自己的领导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接班人

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浪中锻炼出来的。新的革命者要取得革命前辈所具有的革命品质和本领，也必须到群众斗争中去学习，到革命的大风浪中去锻炼。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只有通过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才能够产生和发展起来。革命的新生力量，革命的接班人，也只有在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才能够源源不断地造就出来。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将考验一切人，改造一切人。一切有志于革命的人，都应当亲身参加到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去。在运动中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确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自己锻炼改造成为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很多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还是缺乏直接经验的。许多同志有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但是，这些经验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时期。这样，在新的革命形势面前，在新事物面前，许多同志就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至于年轻干部，许多人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和平环境中长大的，没有亲身经历过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知道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是什么味道，不懂得阶级敌人的手段多么阴险毒辣，不知道地主、资本家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必须从头学起。因此，无论是年轻干部，或者是老干部，都应当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特别是要毫无例外地都到三大革命运动的最前线，即到基层单位中去锻炼。凡是沒有经过基层锻炼的干部，都应当过好这一关。就是过去有基层工作经验、而现在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也需要补上这一课。

^① 毛泽东：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如果不到基层单位中去锻炼，不从亲自蹲点当中取得三大革命斗争的直接经验，就不会真正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就没有发言权，就不可能成为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坚强可靠的骨干，就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资格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果缺乏三大革命斗争的直接经验而又要做领导工作，就势必把事情办坏。如果不是根据自己蹲点取得的经验去领导工作，而只是听汇报、看表报、打电话，往往不能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不能发现工作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别人蹲了点向他汇报，他也听不懂；别人有问题向他请示，他也不好下决心，或者下决心下错了。用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去指挥工作，危险得很。实际上，不到基层去蹲点，不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基层。如果基层单位存在着严重问题，甚至已经蜕化变质，他们就会利用上级的官僚主义去指挥上级，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危害。

到基层单位去锻炼，必须切切实实地蹲下来，和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参加劳动，参加革命斗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真正深入到工厂的车间、农村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中去，从头到尾、善始善终地，把运动的整个过程搞完，取得完整的经验。那种下乡、下厂走马看花、转一圈就离开的人；那种像钦差大臣一样，到群众中发一通议论、收集一点材料就回机关的人；那种下去以后，仍旧只依靠干部的口头汇报、书面材料进行工作，不愿意深入群众亲自调查研究的人；那种下去以后，只传达上级指示，不根据上级指示认真研究和解决下面存在的问题的人；那种下去以后长期住在招待所，住在机关里，不愿意同群众一道生活的人；那种下去以后，不积极参加体力劳动，游手好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那种虽然生活在群众当中，但是对火热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采取不闻不问的冷淡态度的人，等等，所有这些人，都不能叫做到基层单位中，到群众斗争中去锻炼，都不能叫做蹲点，最多只能叫做“走点”或“看点”。如果由于贪图安逸、怕生活艰苦而不愿意到群众中去蹲点，这实际上就已经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开始蜕变了。

在组织广大干部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使他们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现在，一个以活学活用、学用结合为特征的群众性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正在形成。党的各级组织应当继续大力领导好这个学习，要帮助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把丰富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上来；并且使一切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参加到革命实践中去，把书本上学到的革命理论真正变成自己的行动。这样就可以使干部更快地成熟起来，使革命接班人更快地成长起来。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已经涌现并且正在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革命人材。领导的责任，就在



于发现他们，培养他们。这就要求我们做好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第一，把广大干部组织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去。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分期分批地广泛深入地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们党取得政权以来的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教育锻炼干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最好的学校。除了年老体衰和有病不能下去工作的同志以外，各级干部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分期分批地参加到这个运动中去。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率领工作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使所有的干部在思想好、作风好、有群众工作经验的老骨干的带领下，在这个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增长才干。那些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考验和基层工作锻炼的同志，应该比较长时期地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补上这一课，为今后进一步革命化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组织干部到基层、到群众中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做法，应当形成为制度，一直坚持下去。

第二，认真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使干部在劳动中同工农群众保持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保证干部革命化的必要条件。干部参加劳动，不能是一阵风，要经常化，制度化。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要求之一，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是一项永远的制度，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都要实行。老干部、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这项制度。

第三，进一步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要逐步创造条件，使工人和农民有学习政治理论和科学文化的机会。要使学校教育更好地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除了继续升学的学生以外，要把青年学生更好地组织到农业和工业劳动战线上去。这样逐步地做到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优秀的有文化的工农群众和与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革命知识分子就会大批地成长起来。这是生长革命新生力量、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稳妥可靠的道路。经过这条道路，就会涌现出一批能上能下，既能当干部、又能当劳动者，既有书本知识、又有生产技能、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新型干部。

第四，经常地深入地考察干部和积极分子，了解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当伯乐，善于发现“千里马”，善于发现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考察干部要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大节，看本质，反复地观察干部，不仅要听其言，尤其要观其行，力求把人看准。

第五，放手地使用干部，大胆地把经过基层工作锻炼和劳动锻炼的新生力量提拔起来，让他们去挑重担子。同时，要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给他们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

第六，教育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新干部，



关心新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归根到底，要靠老干部来做。一切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者，都应当以身作则带好接班人，为新生力量的成长而高兴。是不是满腔热忱地欢迎和关心革命的新生力量，是不是积极地培养革命的接班人，这是测量每个干部的党性强弱的一个标志。

第七，使广大干部充分认识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意义，克服干部工作中的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这种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表现在有些同志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当前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当前形势下提出的培养接班人的伟大战略任务了解不够，体会不深；也表现在有些同志不大了解新生力量成长的实际情况，需要干部的时候就向上级伸手要，不积极培养，也不主动发现；还表现在干部工作上的一套清规戒律，论资格，排辈数，比级别，套框框。很明显，这种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如果不迅速地克服，就会压抑新生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不可能迅速地成长起来。

第八，经常检查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国家机关的、群众团体的各级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中的执行情况。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中锻炼干部，造就干部，并且使干部经常受到党的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监督。

第九，把各级、各方面的政治工作机构建立起来，把对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切实实地加强起来，大力促进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化。要在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在群众中，加强对干部的了解，有的放矢地对他们进行教育。

第十，对于上述各项措施，都要有长远打算，全面规划。要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做好培养新生力量、培养革命接班人、特别是培养党和国家的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接班人的规划。要健全和加强各级（包括基层）、各方面的领导核心，使它们真正成为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有指挥作战能力的司令部。凡是还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的单位，要有计划地进行整顿、调整和加强。在领导核心中，要把久经考验的老骨干同年轻优秀的新生力量搭配好。各级、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要准备好接班人，把培养对象和培养办法落实下来。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任务，毛泽东同志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已经向我们阐明了。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切切实实地做好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工作。在党中央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全党的努力下，我们党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样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使革命的接班人一批一批地、一代一代地成长起来，使我们的革命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胜利前进。



通讯

評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編者按：張啟勳同志給本刊的一封來信，對馮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初版，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二版，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七次印刷，前後共印八十六萬多冊）的一些重要觀點，提出了原則性的批評，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據編者所知，在馮定同志所著的另外兩本書中，即《平凡的真理》（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月初版，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二版，一九六〇年一月第十次印刷，前後共印三十九萬多冊）、《工人階級的历史任務》（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月初版，一九六〇年五月第二版，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三版，前後共印四十萬冊），同樣存在着張啟勳同志來信中所批評的這類觀點和其他還需要批評的觀點，我們希望讀者和作者一起對此進行研究和討論。

一、張啟勳同志給本刊的來信

編輯同志：

上個月我向《中國青年》投了一份稿，這篇稿子主要是對馮定同志所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書的內容有不同意見。今天他們把原稿退還給我說：“您的來稿經我們研究，覺得在本刊上不適合用”。我想，現在我們都在大學毛澤東著作，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我在讀過馮定同志那本書之後，覺得其中許多地方所寫的論點，與我們的革命思想相違背，不符合毛澤東思想。這本書在青年中流傳很廣，如果對書中的那些不妥當的觀點不加批判，是會害人的。因此，我願意把他們退給我的原稿，向貴刊投寄，請《紅旗》編輯部同志研究，並且希望你們能組織大家對這本書進行討論，以便澄清問題，提高認識。在此以前，我曾把我的這些觀點向許多同志提出，引起了他們極大的興趣，都來參加討論。他們之中，大多數同志同意我的觀點，也有個別同志不完全同意，但都說該書中的許多提法是有問題的。所以，我覺得就這本書組織一次討論，對正在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同志，對我們當前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是有好處的。我也很希望能得到《紅旗》編輯部的指正和幫助，因為我的學習很差，對毛澤東思想領會得不是那麼深，對一些問題的批判也難免有不妥之處，儘管如此，我願本着學習的態度，提出這個問題。



当然，我不知道这份稿子适合不适合贵刊，如果对贵刊不适合的话，请你们也将原件退还给我，最好能加批语，以便指导我今后读书。

张启勛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张启勛同志对《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批评

編輯同志：

在无意之中，从一个同志的书架上发现馮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由于我对通俗的政治理論书很感兴趣，所以一口气把这本书讀了一遍。讀后觉得书中有些地方的写法不太合适，有些观点很值得商榷。因此，願意提出来与馮定同志和其他青年同志們一起討論，弄清是非，特别是书中那些具有原則性問題的观点，必須加以澄清。

《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一九五七年再版。在再版的时候，作者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但基本思想沒有改变。馮定同志在《再版添話》中說：“拿再版和初版相比，书中的基本思想和輪廓、結構等，实在并无多大的差异。”我所談的，多数問題是根据該书一九五八年第七次印刷本，个别問題也参考了該书一九五六年的初版本。

现就下列一些問題发表我个人的意見：

第一，在书中第五节《人为万物之灵》的第六段中有这么几句话：“是的，不仅在地球上，而且在其他的什么星球里，也可能甚至也一定会有人类的；不过这个假說至今尚未证实，而证实了是否能够借星际交通工具来往也还是問題。但是就是证实了，也絲毫沒有减少‘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能够借星际交通工具来往了，那么我們就得和新发现的人类友爱地、亲切地进行和平的竞赛；虽然从我們來說，这样的竞赛还仅只是理想中的事，而今天最迫切的事是在大家要尽一切力量来爭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竞赛，好让亿万的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

作者在談論人生观和世界观問題时，竟然认为今天人类“最迫切的事是在大家要尽一切力量来爭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竞赛”，其目的是“好让亿万的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这种提法，显然是不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階級分析观点的，也不能把它算作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内容之一。什么是今天世界上最迫切的事情呢？我认为，只有更好地、更快地解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即更好地、更快地解决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垄断資本集团同垄断資本集团之間的矛盾，才是今

* 本文引文中的着重点是张启勛同志加的。



天世界上最迫切的事情。这些矛盾又应该怎样去解决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我认为，只有坚决实行这条总路线，才能解决当前世界各种矛盾，而不能采用什么“让亿万人民来比长比短以至最后决定取舍”的办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因此，世界人民，首先是共产党人，应该把一切力量放在如何正确地、迅速地组织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上面，而不应该放在“争取地球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竞赛”上。这样的世界观，这样去认识世界，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观点。

现在，赫鲁晓夫集团正在大肆宣扬“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认为只要他们搞这种“三和”，天下就可“太平”，万事就可大吉了，而馮定同志的这个主张，恰好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显然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十分荒唐的。我们知道，肯尼迪曾向苏联《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宣布过：美帝国主义愿意给社会主义国家二十年的和平时间，条件是不许苏联干涉东欧国家的“自由化”，不许苏联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试问，美帝国主义这样凶恶猖狂，亿万的人民怎么能在这种条件下去比长比短呢？如果不坚决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又怎么能够决定取舍呢？再说，现今世界社会制度的长和短，早已经非常清楚地摆在亿万人民面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更加壮大了这个阵营。从那时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在不断地增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日益地深入人心，使广大人民清楚地看到新生的力量必将战胜腐朽的力量。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比长比短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最后决定取舍的问题，只有经过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能解决。

第二，在第七节《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有规律》的第六段中，作者这样认为：“……在有些国家，如像在我国已经经历了来的，只要工人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那么革命就是仍以民族解放为主，革命就是仍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而革命的胜利也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和平发展了。”

这种举例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都很清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八年英勇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接着就投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是因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了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企图窃取抗日胜利果实。为了消灭蒋介石，我们进行了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消灭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解放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并于同年十月一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显然，不



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不彻底地粉碎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不建立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要在中国实现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根本不可能的。馮定同志在这节里谈到中国革命转变这样重大问题的时候，根本不提革命的武装斗争，根本不提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根本不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抽象地认为，有了革命的胜利，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发展，这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而且还要谈到，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也是充满着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决不像馮定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和平发展的。

第三，在一九五六年初版第七节《群众是主》（再版时改为第八节，标题是《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中的后半部分，作者在阐述个人、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时，看来他是拥护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报告的。书中这样写着：“如果群众自愿崇拜个人，听信这个人的话，以至知道了社会的不断前进归根到底还是靠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于是不仅积极行动起来，而且不能不从个人崇拜，转而不再个人崇拜”。作者这种认识和推论，是与列宁教导我们的关于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相违背的。从总的意思看，作者所说的“不能不从个人崇拜，转而不再个人崇拜”的实质是，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把群众对领袖的爱戴，像赫鲁晓夫那样，说成都是个人崇拜。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广大的劳动人民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会而发自内心地来拥护和听信自己政党的领袖，是因为这个领袖能够想到群众所想的事；说群众要说的话，能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因此，人民群众拥护他、热爱他、听信他的话，是很自然的；同时，也会对有这样一个好党好领袖而感到骄傲。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阶级觉悟越是提高，群众对这个领袖也就会越拥护，越热爱，越听信他的话，怎么能够说群众能从拥护这个人，转而不再拥护了呢？

接着，作者又继续说：“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终究被揭露和开始被克服，归根到底还是群众在起作用”。作者在说这句话时究竟把自己放在什么样一个位置上呢？这句话在苏联《真理报》上刊登的赫鲁晓夫发言或演说中常常提到。赫鲁晓夫这样说，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攻击，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他这种“揭露”和“克服”，是别有用心。正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所说的：“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因此，我不能不怀疑馮定同志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目的究竟是什么？

可能是馮定同志觉得像上面那样宣传赫鲁晓夫的思想，过于露骨了，在一九五七年再版的时候，改变了一种写法。他说什么决不能“夸大个人作用”，“不应将领袖‘神’化”，“如果将领袖‘神’化，认为领袖当做个人是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认为倚靠领袖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就可知道一切和创造一切，那么对伟大艰巨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样是有危害的。”领袖的作用“总是有一定的份量和一定的范围的；而且不管份量多重和范围多大，只要离开了群众，就会



‘寸步难移’，和‘一筹莫展’的；如果还要‘一意孤行’，那末結果不是經常碰壁，便是永远垮台”。“夸大个人作用的最大危害，就是在于使广大的群众不知不觉忘記了自己的力量，阻止了群众的觉悟，抑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因而也容易使領袖或少数的重要政治人物犯錯誤，引致严重的不良后果；至于养成风气，使青年們都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而說話做事只会‘随风轉舵’的人反而得钻空子，好像还是小事。”

只要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写法虽然改变了，但是“基本思想”正如作者在《再版添話》中所說的“实在并无多大的差异”。而且應該說，他反对所謂“个人迷信”的观点，是更加系統、更加恶毒了。

第四，在第九节《成事在人》中，作者在談到解决世界矛盾时說：“現在，从全世界范围來說，就是要解决旧的資本主义制度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間的矛盾，而我們是力求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而不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的。”

馮定同志对解决世界矛盾的这种提法，應該說是背离了革命立場的。今天，从世界范围來說，解决这个根本矛盾的方法，不是我們願意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的問題，究竟采用哪一种方法，这要看客观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我們說，我們坚信資本主义制度一定要被推翻的，一定要灭亡的。但是，这并不是說社会主义国家要用战争去解决这个世界矛盾。关于这一点，讓我們再来重溫一下《紅旗》杂志編輯部写的《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就清楚了。在这篇文章中說：“必須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它的社会性质來說，它們不需要、不可能、不应当、也不允許对外实行扩张主义。”又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它的社会制度性质，同情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絕對不会用发动对外战争的办法，来代替別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各国人民的解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这是从馬克思以来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执政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論点。这个論点也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所說的“革命不能輸出，也不能輸入”的論点。既然这样，馮定同志要我們“力求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而不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无的放矢了。

至于資本主义国家內部，既然資產階級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階級，处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受剝削受压迫的无产階級和广大劳动人民，就一定要起来革命的。怎么样革命呢？馮定同志为他們規定了一条力求用和平的办法来革命的道路，馮定同志的“和平的办法”的内容都包括些什么，我現在还不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現代修正主义者天天在叫喊用“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解决資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并且把这种“和平过渡”吹捧成“拯救”世界人民的至高无尚的法宝。現代修正主义的老爷們这种自己不革命也不让别人起来革命的理論，正在遭到所有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的人民的坚决反对。在今天的世界上，帝国主义——資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灭亡的阶段——就是吃人的野兽。毛泽东同志說：“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学景



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今天世界上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在对待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这个野兽时，就应当像武松那样，而不可能另有他样。

作者在本节谈到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时说：“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人民的关系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的关系，又是不同的”。这一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作者接着又说：“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对于当权的和对于在野的，又是不同的；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里当权的统治阶级关系中，对于比较稳健的和对于一味冒险的又是不同的”。冯定同志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垄断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平列起来，不加原则的区别，显然是错误的。拿美国来说，在美国，不管他是当权的也好，在野的也好，统统都是狼，它们之间的矛盾，怎么能够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相提并论呢？按照一些人的期望，这两种狼都不要争权夺势，让给人民掌政最好，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再看一下，当权和在野之间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当权者不想下台，想继续统治人民，在野者很想上台，想统治人民。不管他们两家，那一个上台，对美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都是同样的受压迫、受剥削。当然，对于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矛盾，是应当看到的，是应当利用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来，他们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是不能调和的。肯尼迪上台也好，约翰逊上台也好，还不都是“一丘之貉”吗？尽管他们人换来换去，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属于一个统治阶级。对所谓“稳健”的也好，“一味冒险”的也好，统统都是如此。所谓稳健的，只不过是更奸诈更狡猾罢了。因此，我们在对待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个争夺统治人民权力的狼，从根本上说来，应当是一个原则、一种态度——坚决反对。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滑到修正主义的轨道上去。请看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早就在叫喊说美帝国主义者中间也有“头脑清醒分子”吗？他们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也有爱好“和平”之意，说他们也在为“和平”而“操心”，也有“明智”的表现。面对这些事实，我们除了积极揭露和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外，不能有什么其他态度。如果有的话，那是骗人的，是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的，是现代修正主义观点。

第五，在第十一节《群众观点》中说：“共产主义并不否认一己的利益，也不否认个性；而是说，只要阶级消灭了，那么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就会互相接近而一致起来的。”

我认为这种提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有原则性错误的。怎么能够说只有阶级消灭了，才能使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统一起来呢？人们要问：现在在中国的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难道个人的利益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只有对立没有一致吗？在我们国家里，无产阶级已经获得了解放并掌握了政权，广大农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也都随之翻了身。所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都拥护代表自己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党和政府。从根本上来



說，个人利益和国家整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例如，現在党和政府为了使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大国，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制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都代表了我們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因此，我国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号召，都是一呼百应地响应，并积极投入各项建設运动。至于个人爱好和个性的問題，那是永远也不会完全一致的，就是阶级消灭了，也还是不能一致的，因为后者的一致和前者的一致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性质的东西。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是有矛盾的，这就要求大家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如果有人一定要本末倒置，那么他必将受到人民大众的批評以至于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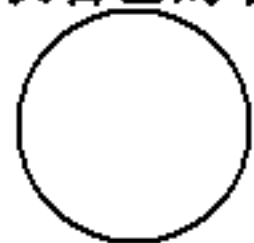
作者在阐述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发生矛盾时举例說：“比如董存瑞和黄继光，正因舍弃了一己的生命不仅可以挽救許多同志的生命，战役的胜利和革命的胜利不仅可以挽救更多的同胞的生命，而且还为新生、后代建立永久和平幸福的生活，于是就出現‘視死如归’而使人可歌可泣的業績来了。自然，董存瑞和黄继光，在一瞬間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詳細的比較、考虑和选择的，而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

我看作者对我們的英雄先烈們的評价也太主观片面了。怎么能够說我們的共产主义战士和英雄，在为党为祖国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立功的时候，沒有去很好地考虑这种行动是为了党为了祖国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呢？怎么能够錯誤地认为“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呢？如果說他們在这种伟大动人的場合上只凭感情和冲动办事，这不是对我們英雄的誣蔑嗎？我們当过兵的同志以及今天尚活着的董存瑞式的黄继光式的英雄們，是不会同意这种对英雄的誹謗的。我們认为，董存瑞也好，黄继光也好，楊連弟也好，丘少云也好，罗盛教也好，他們在准备为祖国牺牲的时候，是經過了比較和考虑才做出选择的，因而他們在祖国需要的时刻，毅然决然地完成了党和祖国人民交給他們的光荣任务。我們的这些英雄是有远大理想的，有高貴的共产主义品德的，有正确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他們的牺牲，决不只是一时的冲动。这是为了国家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一切的光輝榜样。如果作者不相信这点，請你去問一下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还活着的黄继光式的英雄吧。在写到这里时，由于深受先烈的英雄事迹所感动而不能不再高呼：烈士永垂不朽！

以上就是我讀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书后提出的个人意見。由于時間关系，只看了一两遍，所以对問題的理解可能也有片面或根本不对头的地方。尽管如此，我还是願意大胆地提出来与作者商榷，也希望其他青年同志們对上述問題发表自己的看法。

最后望来信指导。

致以革命的敬礼！



张 启 勛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周谷城是怎样袒护秦桧、 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的

金应熙

近来看到周谷城先生和别人讨论文艺问题的文章，感到他的文艺观点是和他的历史观点密切关联的。例如他现在讲的“无差别境界”“断而复续”等等，就和他一贯主张的“地主佃客相反相成”那一套一脉相承，同是阶级调和论。因此，我觉得有对周谷城的历史观点展开讨论的必要。周著《中国通史》中包含有许多非常严重的错误，但周谷城从不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有人指出《中国通史》的错误和不良影响，促请他注意修改，他还悻悻然表示不能接受，并且指责批评者的态度是错误的。^①现在在我仅就这本书论述南宋初年对金和战问题时袒护秦桧、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一事，举例指出周谷城错误的严重。

南宋对女真贵族的侵略应该投降还是抗战，秦桧是有识之士还是大汉奸，自来已有定论，本是绝对不应成为问题的。三十多年前，当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急要解决战与不战的问题的时候，有人企图为秦桧翻案，说南宋不该抗战只该投降，这实际上是为当时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投降路线寻找“历史根据”，随即受到严厉的驳斥。一九三八

年底到一九三九年初，日寇加紧诱降，汪精卫公开投敌；有些日本人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表扬秦桧，鼓励投降。他们对于这一项“学术研究”的政治目的是毫不隐讳的：“在汪兆铭已经发起了和平救国运动、中国主战论和议和论的对立已成为吸引我们注意的切实问题的今天，阐明南宋初期的和战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往往被人拿来和今天的状况比较讨论的），这应当是我们（日本）历史家的职责”^②。他们还公然叫嚷“中国应当向秦桧的议和论学习”^③。在这种情况下，周谷城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当时沦陷的上海初版发行的《中国通史》中竟也袒护秦桧，打击主战派，基本上重复申述了日本人著作中的论点，岂不是公然为敌伪张目吗？

让我们来看周谷城是怎样替秦桧翻案，宣传民族投降主义的吧。

- ① 见《新建设》1958年第9期所载周谷城对古田同志批评的答复。
- ② 见外山军治：《岳飞与秦桧》序言，东京富山房1939年日文版。
- ③ 这是日本《外交时报》上一篇论文的题目。见《外交时报》第794号，1938年出版。



“和则存，战则亡”——这是民族投降主义者在侵略者面前得出的结论。周谷城为了证明“宋对金的屈服妥协成了必然之势”^①，为了证明当时主张继续抗战只是大言误国，就不惜颠倒黑白，完全漠视一一四〇年前后南宋反抗女真贵族侵略的大好形势，并且把英勇抗击侵略的武装力量说成一团糟。

在反抗女真统治阶级侵略的武装力量中，民众自发的抗战组织占有重要的地位。单以河东、河北数十万民兵而论，他们一直牵制着女真的大量兵力，屡次击败敌人，连粘罕的大营也一度几乎被民兵攻破，女真贵族因此不敢轻易渡河南下。一一四〇年岳飞所部对金作战的胜利，是和岳飞连结河朔忠义的做法分不开的。对于民兵的英勇战功，许多历史家是同声赞许的。但是，当日本侵略者于抗战初期在华北各地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有某些所谓“历史家”对中国历史上的人民武装却十分痛恨起来，对两河忠义的民兵恶毒咒骂：“宋国的人们，口里高唱抗金和收复失地，成立义勇军的不少……不过这些都是乌合之众，没有任何统制的，比盗贼差不很远”，并且完全抹杀忠义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②。可怪的是，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对于抵抗侵略的人民武装，竟也抱着轻蔑的态度。他声言“动乱的民众，在种族战争激烈之时，常为两造所欲夺取之势力”，“谁能取得成千成万的大众，谁的实力便要增加”^③。这说明了在周谷城心目中人民武装绝不能成为抵抗侵略的主体，而最多只能是统治者所争取、所利用

的一枚卒子。周谷城甚至认为会有起义农民领袖率领“成千成万的大众”去投奔侵略者。这是对中国人民大众的极大侮辱。事实上周谷城除了把先为土匪后当汉奸的李成、孔彦舟等人冒称起义农民外，并没有能举出南宋人民武装投向侵略者的任何例子。对于人民武装反侵略的战绩，周谷城是根本不放在眼内的。对两河忠义他只一语带过，毫未提及战功，而另外他在书中说到明末大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时，更非常轻视地说：“其实这时的流贼已被大明的统治阶级与满洲的游牧贵族打得疲癯残疾，尚复有何战斗力可言？永明这时与他们联络，给他们以封号，终属无益。”^④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周谷城对于李定国在桂林、衡州消灭了清朝两个大将（孔有德等）的部队，震动全国和后来支撑西南危局的事迹，当然不该毫无所知的，为什么偏要不顾历史事实发表这种含沙射影的议论？我很怀疑，周谷城当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对于公开和隐藏的汪精卫的分裂阴谋，又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

周谷城又极力丑化赵宋政权属下的军队。他列举所谓“武人”的三大缺点，并总结为“武人只顾私利，不上前线，专事剝削，不恤人民，且彼此之间，各相夸耀，互生仇

①③④ 《中国通史》(下册)，1941年9月桂一版，第738、737、916页。

② 见前引日本《外交时报》论文。



疾”^①。軍隊的情況如此，再打下去自然沒有勝利希望，因此南宋“當局者有了戒心”，不得不“力主和議”。

這種說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南宋軍隊本來是一支為地主政權服務的軍隊，不免帶有地主階級軍隊腐化、怯戰等一般特點，將領中也會有些驕橫不法，臨陣先遁，甚至聞恢復之議則怫然不樂的人。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是，趙宋王朝原有的武裝隊伍基本上已經在對金戰爭的初期中被打垮，後來的部隊是在反侵略戰鬥中新建立起來的。其中將校尤其兵士大部分來自秦晉齊魯等淪陷地區，“還我河山”的要求很強烈，反侵略的戰鬥意志還是比較旺盛的。由於堅決抗戰得到民眾的支持，有些部隊的軍民關係也比較良好。以岳飛、韓世忠和吳氏兄弟為代表的廣大將校在民眾和士兵的推動下是英勇抵抗女真貴族侵略的。^{*} 正因為還有這一面，所以在一一四〇年前後宋軍在抗擊女真貴族中曾經獲得多次重要勝利。如果宋軍真正像周谷城所描寫的那樣一團漆黑，那末這些勝利就將成為不可解釋的史實，而女真貴族也早就可以長驅直進，不需要玩弄“以和議佐攻戰”^②的陰謀了。為日寇侵華服務的日本史學家，出於對中國人民抗戰力量的敵視，就歪曲歷史事實，別有用心地污蔑當時南宋軍隊“是由匪賊和敗殘兵出身的，素質很壞”，硬說“軍閥諸將恐怕失掉私兵，總是缺乏犧牲的精神，而且互相爭奪勢力，不相協調”，因此“縱然可能偶有一二場局部小勝，希望取得全面的大勝利是不可能的”^③。

周谷城為替秦檜投降辯護而詆毀南宋抗擊女真的軍隊，其議論與日本侵略者的腔調何其酷似！

在談到秦檜等漢奸時，周谷城的感情就完全不同了。他襲用趙翼的說法，把反對議和投降的人叫做“義理派”，而把贊成投降的稱為“時勢派”^{**}。在他看來，義理派都是些“不負實際責任”的人，“高談闊論”，“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和這相反，時勢派像秦檜等人則是“大有識見”的，其主張是“切中時勢”的，他們為“對金人妥協”做了許多“預備工作”，有效地取得了“可以與人妥協的資格”，最後在秦檜所主持的一一四二年和議中收到了“巩固統治權力”的效果。就這樣，周谷城明目張膽地宣傳了“賣國無罪論”。

周谷城借口時勢需要議和來試圖洗脫秦檜的賣國罪行。我們知道，對於同一種“時勢”，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估計的。一一四二年以前南宋抗金的局面是，軍事上、財政上都大有起色，前綫捷報頻傳，女真後方的

① 見《中國通史》（下冊），1941年桂一版，第745、746頁。以下引用周著原文，凡見於這一章的，不另注明。

② 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七·太宗紀。

③ 《岳飛與秦檜》，第187頁。

* 岳飛、韓世忠等人在作戰中往往都能身先士卒，岳、韓兩人之間曾有嫌隙，後來也以抗敵大局為重，弄嫌修好。岳飛所部相約“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打仗”，軍民關係比較好。這些事實說明周谷城所舉的三大缺點都不是普遍的。

** 事實上周谷城對時勢派的定義是矛盾、混亂的，例如他竟把主戰的韓侂胄算作時勢派。



人民武装正要大举响应，进军中原。这在一切志切恢复、要求“还我河山”的人们看来，自然是一片大好形势，是不可错过的良机。但是从决意屈辱投降的人们看来，对女真的侵略招架一下只不过是争取妥协的“预备工作”之一，只不过是为了取得“可以与人妥协的资格”，也就是所谓“战而后和，和而后安”，作战只是投降的手段，他们当然就会认为万万不能再打下去，应该赶快签订屈辱的和议了。他们的心里还要嘀咕，万一岳飞等人連結两河忠义民兵取得了抗金的胜利，自己的政权是不是会动摇哩。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形势估计中，周谷城是完全同意了后一种亦即汉奸卖国贼的估计的，他的书中就是把“击败伪齐刘豫”、“一度击败金人”等和南宋对农民起义的镇压一并算作妥协的预备工作，既然一切都是为妥协投降做准备，那末周先生对大汉奸秦檜的赞许也自然没有什么希奇了。

秦檜所締結的和議，就是投降，就是向女真统治者臣服称藩、跪拜奉詔。如果卖国贼秦檜而可以说成“切中时势”的“有識者”之一，那末，不但岳飞、韓世忠等抗战派的功績和民族气节要一概被否定，而且对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民族气节岂不是也应该一律否定嗎？

周谷城还替秦檜表功，說和議巩固了赵宋統治权力。人所共知，秦檜在被俘之后，南归以前，就已死心塌地投靠女真贵族，身充撻懶的軍事參議，为他起草誘降楚州守将的檄文；南归以后，一向挟金人以自重，到

了再任宰相，就更公开摆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身分，要挟赵构。^{*} 这样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搨客，他心目中只有女真贵族的利益和自己的权位，并没把赵宋政权放在心上。正如一个宋人所說的，秦檜的主张和議，“上不為宗社，下不為生民，中不為息兵待时”。和議締結后，秦檜凭借金人的气势，独攬大权，赵构备受胁迫，經常在靴中帶着刀子准备自卫，到秦檜死后才放下心来。所謂赵宋統治权力的巩固在那里？所以，說秦檜議和巩固了赵宋政权的讲法，不过是为秦檜辯护的一种手法，同抗战期間大汉奸汪精卫和頑固派蔣介石所宣揚的“曲綫救国論”是一模一样的。

以上所举出的周谷城袒护秦檜、贊成投降、詆毀主战派的言論，直到一九五六年修訂《中国通史》下册的时候，周谷城除了改动个别字句外，实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近年来已先后有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周谷城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我以为結合抗战初期的形势来批判这种宣传卖国路綫的言論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写了这篇短文，希望引起大家的討論。

-
- * 在主张投降屈辱这一点上，秦檜和赵构是一致的，但是两人却各自从自己的打算出发，赵构投降是为了苟且偷安，为了确保儿皇帝的地位，而秦檜主张投降則由于他是金人的奸細。两个人之間也存在着不少矛盾。



学习列宁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

——读《国家与革命》的体会

黄宗汉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特点，也是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

列宁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始终非常重视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指导革命行动。他反复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①列宁本人正是最善于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他不仅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目前，当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正在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的时候，认真学习列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对于我们学好革命理论有很重要的意义。这里，我想谈谈个人在读《国家与革命》中，所体会到的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

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

为学而学，还是为用而学？无的放矢，还是有的放矢？这是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列宁研究革命理论，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过革命斗争的需要。他还在年青的时候，就为了探求革命的真理，而去认真攻读他所能找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此后，每当革命形势提出要求，或当马克思主义遭到机会主义者歪曲和糟蹋的时候，他总要带着问题重新钻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著作，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回答革命运动中提出的问题，批判机会主义观点，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国家与革命》及其写作过程，就是列宁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带着问题研究经典著作的明显例子。这部伟大著作写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当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革命危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尖锐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① 《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99页。



的問題。处于帝国主义陣綫最薄弱环节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已經成熟。以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經是在俄国工人阶级面前的迫切任务。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武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领导他们夺取政权，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迫不及待的课题。

可是恰恰在这样的时候，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却把国家问题弄得极其混乱，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荒唐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例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胡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迷信议会制度，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他们遗忘、抹杀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更在这时大力贩卖上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力图引导苏维埃政权充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附属品。因此，在这个时候，批判机会主义观点，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不仅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政治实践意义。列宁说：“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不能展开斗争，不能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

正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列宁全面而深刻地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有关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法兰西内战》、《论住宅问题》、《论权威》、《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以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和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至二十八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等等。列宁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各个基本方面：关于国家的起源和阶级本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行消亡的经济基础，等等。《国家与革命》对这些问题作了详尽而透彻的论述和发挥，回答了俄国革命实践提出的问题，粉碎了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和进攻，向群众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告诉群众“为了使自已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这样，《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的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巨著，就成了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纲领，成了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行动指南，并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表现在《国家与革命》的写作上，而且贯穿在列宁一生的理论活动中。例如，当民粹派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阻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阻碍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时，刚刚踏上革命征途的年

* 凡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或转引自《国家与革命》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



青的列宁，就深入地钻研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著作，并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彻底批驳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阐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一九〇五年，当俄国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要求布尔什维克制定革命策略时，列宁就认真地去研究有关革命和起义的著作，特别是《法兰西阶级斗争》等总结欧洲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经验的著作，并结合俄国实际，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名著，批判了孟什维克的機會主义策略，论证了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策略，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以工人阶级为领袖的工农联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等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当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反革命势力向工人阶级大举进攻，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修正主义者猖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贩卖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马赫主义时，列宁就全面而系统地钻研了《费尔巴哈论纲》、《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所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的巨著，彻底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反动哲学思潮，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和科学发展的成果，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醉心于马克思的著作，……是为了‘请教’马克思，以便从他

那里找到对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①“他不是以书呆子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是以一个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寻找答案的人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②对于列宁说来，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伟大的革命科学，永远是指导革命行动的锐利武器。

对比研究和批判反面材料

列宁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既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又非常重视同反面材料作对比研究，重视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揭露和批判。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不仅研究马克思写的著作，而且还研究资产阶级营垒中他的敌人們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著作。他在同这些敌人的论战中來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把‘批评家’的意见仔细地作成概要，择出其中最显明、最典型的东西，并将马克思的言论与之对比。他仔细分析‘批评家’的言论，竭力指出它们的阶级实质，把那些最关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突出地摆出来。”^③

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深入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一切有关国家问题的著作，而且仔细研究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如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考茨基的《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社会革命》、《取得政权的道路》，普列汉诺夫的《无政府主义

①②③ 《論列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8、5、335—336頁。



和社会主义)等等。列宁研究反面著作同样非常认真,把这类著作也作了笔记,加上评语。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除了摘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材料外,还有摘自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著作的材料,以进行比较和批驳。例如,笔记开头在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后,紧接着就揭露伯恩斯坦对这句话的歪曲。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胡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无产阶级应该放弃夺取政权,放弃革命,而靠缓慢发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列宁批判说:“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马克思的意思完全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革命应当把它,把这个现成的机器打碎,并用新的来代替。”①

列宁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著作对照起来研究,而且还同第一国际时期及第一国际以前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著作对照起来研究。《国家与革命》为了揭穿考茨基恶意混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界限,就对照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论点,严格划清了两者的界限,明确指出他们之间的三个根本区别:(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共产主义建成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

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不懂得必须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

为了深入掌握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阐述自己的观点的,列宁不是满足于简单地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成的结论,而是常常不厌其烦地亲自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所批判的那些机会主义著作。有一次,他读了马克思一八五八年二月一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马克思在信中对拉萨尔所著《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给予严厉的批评,说这书是“小学生”的作文。于是列宁就去读拉萨尔的这一著作,把它作了笔记,加上评语。在评语中他对比说:“在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东西,他所感到兴趣的就是从黑格尔和从费尔巴哈继续向前的运动,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前进运动。在拉萨尔这里则是反复咀嚼黑格尔在个别问题上的看法,实质上就是抄袭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引文的论述和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论述。”②

①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页。

② 《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86页。



列宁不仅重视研究和批判机会主义著作，而且也很重视研究和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的谬论。《国家与革命》对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的谬论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把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的批判，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诬蔑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批判，都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批判中，列宁总是揭露机会主义者怎样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为资产阶级效劳。

列宁还很注意研究有关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著作，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从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那里批判地吸取养料，并加以革命的改造。由于列宁认为“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①，因此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去深入钻研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他的《哲学笔记》就是有力的说明。

目前，当现代修正主义大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列宁这种研究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在越南阮爱国党校欢迎会上的讲话中，要我们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每个问题上，都对照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怎样讲的，老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是怎样讲的，现代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怎样讲的。刘少奇同志说，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学习，“我们就会真正懂得客观形势究竟是怎样发展的，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又是如何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面孔就

会一目了然，清楚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我认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这样做，一定可以大大地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百倍地增强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力量和信心。”^②

历史地具体地考察每一个原理

对每一个原理历史地、具体地并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注意它的历史背景，考察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掌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线索，这是列宁研究经典著作的又一个重要方法。

《国家与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研究，就是这样。这部著作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全面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论著，深入而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学说的丰富和发展过程。

在第二章中，列宁首先研究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指出这两本早期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已经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共产党宣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即“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然后“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

①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4页。

② 1963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集中在已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无产階級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但是，列宁說，由于革命經驗的限制，在这里，“国家問題还提得非常抽象，就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

接着，列宁研究了馬克思总结欧洲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革命經驗的著作。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写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中，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階級专政”这一科学概念，并闡明了这种专政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方面的任务。一八五二年写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根据法国階級斗争和革命的經驗教訓，指出“迄今一切政变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无产階級必須“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行政权力”，把資產階級的軍事官僚机器彻底粉碎。列宁說，“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論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回答了“究竟应当怎样以无产階級国家来代替資產階級国家的問題”。“这个結論是馬克思主义国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但是，“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須消灭的国家机器的問題，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經驗的。”

在第三章中，列宁全面研究了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經驗的伟大著作《法兰西內战》。这部著作強調“工人階級不能简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进一步指出必須彻底摧毁資產階級的軍事国家机器；并且回答了用什么东西代替被粉碎了的国家机器的問題：“公社是一个高度灵

活的政治形式”，“它实质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終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在这里还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基本特征、无产階級专政条件下的階級斗争以及公社的发展前景等等。《法兰西內战》大大地丰富了馬克思主义的无产階級专政學說。

第四章，列宁考察了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論权威》、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至二十八日給倍倍尔的信，《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为《法兰西內战》写的导言等著作；研究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怎样結合批判机会主义观点，进一步总结巴黎公社的經驗，論述和发挥了无产階級专政學說。例如，列宁指出，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对《哥达綱領草案》中关于“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批判，是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問題“最精彩的論述之一”；信中关于“公社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提法，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論断”。在《法兰西內战》导言中，恩格斯总结了法国历次革命的經驗，指出資產階級絕對不允許被压迫階級掌握武器；根据巴黎公社的經驗，闡述了无产階級专政的一些极重要的思想，如进一步強調了无产階級革命必須彻底鏟除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論述了保证无产階級国家机关成为社会公僕的两个有效办法（国家机关人員由普选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換；他們的工資和普通工人的工資相等），等等。列宁指出这些論述“可称为馬克思主义在国家問題上的最高成就”。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91、489頁。



为了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发展和消亡问题，在第五章中，列宁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总结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历史，总结了他同无政府主义者否定国家和拉萨尔派关于“自由的人民国家”学说的斗争史，明确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典性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列宁对这段话作了详尽的论述，他再次强调“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哥达纲领批判》提出了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的原理，列宁为了研究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对这个原理进一步加以论述和发展。列宁详细地分析了两个阶段的特征、区别和联系，分析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的法权”，还必须坚持不懈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自行消亡等等。

由此可见，列宁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时，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有关著作联系起来，并把它同具体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从发展的观点进行系统考察的。通过这样的考察，列宁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是怎样根据革命实践提出来的，又是怎样在革命运动和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就有力地帮助我们掌

握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及其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战斗性。同时，列宁通过这样的考察，令人信服地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条红线，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测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国家与革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发展史的同时，全面地研究了国家这个客观现象本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并把这两方面的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十月革命后，列宁在《论国家》的报告中，曾强调从历史上探讨某种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的方法，是社会科学上最可靠、最科学、最能弄清问题实质的方法。

列宁在研究经典著作时，还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怎样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的。例如，他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致左尔格等人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作了比较。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英美“无产阶级还完全受资产阶级政治的支配；一小群社会党人由于宗派主义立场而脱离了无产阶级”^②等特点，坚决号召英美社会党人“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铲除自己组织中的狭隘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精神”。^③他们针对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1页。

②③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8、356页。



产阶级很早就成立政党，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着机会主义的观点和路线等特点，坚决教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要陷入庸俗观点、‘议会迷’和市僧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泥坑”。^①列宁说：“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②。

列宁在进行这种分析对比的同时，尖锐地批判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恶意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美工人运动的劝告，简单直接地应用到俄国来的做法。列宁指出，根据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的特点，应该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教导提到首位，大力反对机会主义者“用议会主义观点把工人运动的任务庸俗化和用庸人观点缩小工人运动的规模”^③。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列宁是多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具体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现实斗争中来。

用新经验丰富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列宁在理论研究中，既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过：“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

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門科学向前推进。”正是伟大的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各个方面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列宁对《资本论》非常熟悉和精通，经常引用其中的观点来分析实际问题。据统计，在《列宁全集》前三卷中，引用《资本论》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但是，列宁没有停留在《资本论》的观点上。在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它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许多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规律和矛盾，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期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研究曾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同时举行进击才能获得胜利。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时期大大加剧，出现了跳跃式的状态；由于这种情况，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无产阶级就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战线最薄

①②③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6、345—346、357页。



弱的地方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列宁得出新的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获得胜利；而不可能同时在一切或大多数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在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民族殖民地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列宁也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创造性的发展，把它们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了创造性的发展。按照原定的计划，这部著作最后还有一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經驗”。显然，列宁是要在这章中用俄国革命的新經驗系統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論的。后因忙于领导十月革命而未写成。列宁对于爆发革命而“妨碍”他的写作，感到高兴，因为他认为，“做出‘革命的經驗’总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但列宁在其他許多著作中，已經对这些革命經驗作了总结。

虽然如此，《国家与革命》第一至六章中，列宁不仅捍卫了而且也已经用新的革命經驗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斯大林指出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在于：

“（甲）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經驗，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乙）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

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

（丙）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①

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这些发展，是在《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加以阐发的；其基本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中都已经有了。在《国家与革命》中：（1）明确宣称俄国无产阶级要为“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斗争。（2）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强调没有工农联盟，“民主制就不能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完成”。（3）指出“民主制达到了一般想像的最充分最彻底的程度以后，就会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一次提供了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

^①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7页。



列宁教导我們不要“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①，当然也要求人們不要把他的理論看做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形式，列宁虽发现了苏維埃，但他并不认为它是无产階級专政的唯一形式。列宁說：“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階級专政”。

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对比研究和批判反面材料、历史地具体地考察每一个原理，用新經驗丰富和发展馬克思主义理論等这些列宁研究經典著作的态度和方法，是列宁自己經常強調的理論联系实际方法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在这里，列宁为我們树立了理論研究和现实斗争紧密結合，讀書和战斗紧密結合的光輝榜样，永远值得一切馬克思主义者学习。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貫坚持和提倡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即理論联系实际的方法去研究革命理論，一貫重視和坚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們的学习》以及在整风运动中发表的其他一系列文献，对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方針作了精辟的論述。他反复教导我們，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必須采取“有的放矢”的态度，即“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要“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

場，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統一的态度。反之，那种“为了单纯地学理論而去学理論”、“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即“无的放矢”的态度，是反科学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党性不純的表现。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問題为中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則为指导的方針，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②二十几年来，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一直成为我們全党同志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根本准則。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現代修正主义者之間，正在展开一場越来越深入的关系世界革命前途、关系全人类命运的大論战。为了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研究当代革命問題，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我們必須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在学习中，我們必須認真学习和运用上述列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方法，認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如何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指示，認真貫徹刘少奇同志在越南阮爱国党校講話的精神；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毛泽东思想，更有力地开展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① 《我們的綱領》。《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87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799、803頁。



从实践中提出学习课题

徐非光

学习理论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对于最广大的同志来说，最好的学习方法，是积极参加实践斗争，从实践中提出学习课题，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请教，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这些课题，指导自己的实践行动。这也就是带着问题学习的方法。

要带着问题学，就要先有问题。问题从哪里来？只有从实践中来。我们参加了实践，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反映到自己头脑中来，这就是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去学习革命理论，就比较容易使理论和实际真正结合起来。

同时，学习革命理论，能否深刻地理解和正确地运用它，同实践经验的多少，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没有实践经验的人去读它，虽然可以记住其中的某些词句，但却不容易懂得其实质所在；一个革命经验丰富的人去读它，就比较易于领会和把握它的丰富内容和精神实质。同样一本书，我们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去读它，也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每读一次，那些与我们当时的实践联系最密切的部分就往往会突出出来，给我

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会学习过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由于当时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战争，还没有在实践中充分接触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从这些理论中比较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并获得为这种美好前途而斗争的力量。革命胜利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再来学习这些理论，它对于我们就亲切多了，但是，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自己的实践经验的时候，对这些理论的领会还不可能很深刻，也不会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运用它。在经过一段实践之后的今天，再重新学习这些理论，我们对它的理解就深刻得多了，并且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运用它了。这三种不同的感受，正是由我们的实践经验的多少所决定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当我们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去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请教的时候，我们能否正确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又和我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深浅、实践经验的多少有关。实践经验丰富的人，比较善于提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有关情况了解



得比较清楚，因而也就比较善于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实践经验少的人，由于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提问题往往不能抓住要害，即或能正确提出问题，也会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而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运用理论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好比射箭，虽然射出了，未必中的。更坏的情况就是从主观出发，从想像出发去办事，使理论同实践脱节。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首先仍然决定于我们对当前实践的认识程度。

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说的理论。”^①因此，积极参加实践斗争，从实践中提出课题来学习理论，最易于了解理论的精神实质。

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只有取得丰富的实践经验之后，才能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那些还没有或者还很少有实践经验的青年学生来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必要的，这可以使他们获得一些基础理论知识，达到逐步改造他们的思想的目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这些理论知识。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学到一些书本知识（这是必要的），但是还不等于他们已经完全理解和掌握了它。他们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反复学习，逐步消化，检验它，应用它，然后才能真正掌握它。

这当然也不是说，从实践中提出课题来进行学习，就不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担负领导工作和做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来说，只要有可能，都应当认真多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多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样做，可以使我们高瞻远瞩，富有预见，把工作做得更好。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即使我们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有了比较丰富的理论知识，我们还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地学习我们已经学过的东西，学习我们还没有学过的东西，使我们的理论水平跟得上形势的发展。

我国人民正在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是极其丰富和极其生动的群众革命实践。它向我们提出了许多课题，要求我们给以科学的分析，正确地认识它和解决它。同时，随着实践斗争的发展，新的问题又会不断出现，又会继续向我们提出许多新的学习课题。我们广大同志应当密切联系实际，带着从实践中提出的课题，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且把它们运用于实践中，经受检验，很好地为实践服务，从而把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9页。



反面教材不可不讀

· 陈 展 超 ·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互相矛盾的对立方面。正面和反面，对立地统一于事物之中。事物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中发展，正面战胜了反面，推动了事物的前进。然后，事物又在新的矛盾的过程中通过斗争向前发展，永无休止。一分为二，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我们应当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采取从客观，不从主观，从发展，不从停滞，从互相关联、互相比较、互相斗争，不从孤立、调和的方法，去认识事物，掌握事物。

在学习革命理论上，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向来是我们最信赖的老师。我们必须勤勤恳恳地、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请教，从他们的著作中，学习真理，认识真理，找到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武器。同时，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更有能力地在极其复杂的革命环境中，分清敌我，辨明是非，经常保持正确的方向，我们还需要认真地研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的观点，也就是要认真地研读反面教员提供的材料。

这种学习方法是我们党向来提倡的。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五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内阮

爱国党校欢迎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争论的每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认真地对照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怎样讲的；老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是怎样讲的；现代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怎样讲的。这就是说，我们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还要研读反面教材。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

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也是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的。真理是在同谬误的相互斗争中发展的。只有通过斗争，真理才能克服谬误，向前发展。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武器，它不仅要坚决地打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观念，坚决地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彻底决裂，揭露它们欺骗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凶恶面目，而且要同从工人运动内部产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作斗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战胜了一切同它敌对的思想体系，日益为无产阶级所接受，所拥护，所掌握，成为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一切重要的理论观点，都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因此，当我们自己置身于当前的实际斗争中，将反面教材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述相对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在什么样的斗争环境中提出来的，为了什么目的提出来的，它针对了哪些敌对观点，又是如何战胜了敌对观点的。这种从对照中的学习，有助于我们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有助于我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使我们在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得到实际的锻炼。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又充当反面教员，在给人们上课。他们为了对人民进行欺骗，总是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硬说他们的论述，是有“事实根据”的，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事实，还是虚构，是剖析了事物的本质，还是歪曲了事物的真相；到底是真道理，还是假道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所有这些问题，在我们阅读反面教材的时候，一下子都提到了我们的面前，要求分辨清楚。这样，也就促使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显微镜”，将这些“事实”、“道理”仔细地照一照，进行一番调查研究 and 独立思考。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有了这样一照，或者几照，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谬误终究遮不住真理的光辉；人们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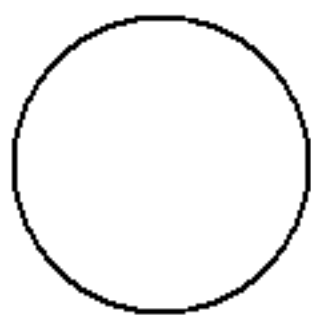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许多观点，不仅同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同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言论相呼应，其中有的还是直接从后者抄来的，并没有什么创造。这样，现代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卖人民利益，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的丑恶嘴脸就原形毕露了。

这种对照反面教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正如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是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用这种方法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争论，“我们就会真正懂得客观形势究竟是怎样发展的，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又是如何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面孔就会一目了然，清楚地暴露在人们的面前。”^①

认真地研读反面教材，可以使我们增加阶级斗争的知识，增长对敌斗争的经验。因此，这个学习很要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实践证明，来自反面的教育，常常是极其深刻的。特别是反面教员自我暴露，把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公诸于世，能够更有力地说服人，更深刻地教育人。一八四四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同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的斗争时，曾经这样说过：“很难使荣克和其他许多人相信，我们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他们还老是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私人的争吵。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而且会认

^① 《刘少奇同志在河内阮爱同党校欢迎会上的讲话》，1963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为轻率地抛开像卢格这样一个‘著作界权威’，终究是很可惜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应当等待一下，等卢格再干出一件能清楚地向这帮人证明他是个什么人的天大蠢事来”^①。恩格斯的这段话，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的确，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反面教员，从他们的反动阶级立场出发，怀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仇恨心理、恐惧心理，力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总是不断地抛出大量的反动言论，干出各种各样的坏事来。这样，就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反面教材，使我们从“反面的启示”（马克思语）中，懂得了什么是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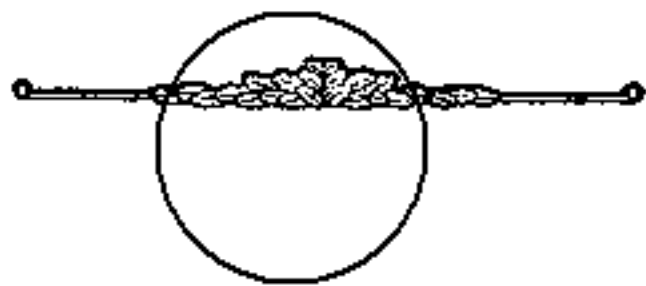
正因为这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我们党除了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以外，只要有可能，还将反面教材公布出来，登在报刊上，加以广播，让人人看到，人人听到，都来“欣赏”，都来鉴别。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火炼，真理愈辩愈明。我们敢于公布反面材料，是因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敢于让人们看到、听到，是因为我们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定

地信任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也会有少数人利用我们公布的反面材料，欺骗人民。但是，这并不足为惧。广大人民是会通过严肃的、认真的思索和讨论，弄清事实，辨明是非的。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的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加了“免疫力”，增长了识别谬误的能力，将会锻炼出善于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作斗争的本领。

当然，研读反面教材，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譬如，反面教材又臭又长，语言晦涩难懂，令人读了味同嚼蜡。但是，既然是反面教材，可以从反面来教育人，那末，耐心地研读它，也是需要的；花费一些时间，也是值得的。我们应当抓住这个从反面提供的最具体、最生动、最实际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机会，而不要轻易地放过它。

总之，这种学习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真理，掌握真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通过这种学习方法来锻炼自己。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页。



評	介	三	本	經	濟	史	料	書
---	---	---	---	---	---	---	---	---

这几年，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属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其他一些单位，编写了一批典型企业的史料。其中有的是档案资料的辑录，有的是编者深入企业亲自所作的调查。为了调查、编辑、整理、校正这些资料，编辑人员经年累月地埋在堆集如山的档案中，细心剔选；奔走于各地，寻根问底，花费了大量的劳动。他们的这个工作做得好，是有学术价值的。

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要我们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并且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①

在专史的研究中，经济史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过去，没有有组织地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全国解放以后，各地建立了科学研究机构，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档案资料公开了，有些单位才开始有组织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间虽然不长，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下面评介的三本书：《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北京瑞蚨祥》，就是这一批成果中比较好的。

收集和研究经济史料，大体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辑录企业的档案、文献，《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就属于这一种；另一种方法，是向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和一部分资本家作调查，《北京瑞蚨祥》就部分地采用了这种方法。从收集和研究资料的总体来说，两种方法都需要，很可能大量的还是采用第一种方法。但是，从获得资料的时机来说，后一种方法很值得重视。因为私营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企业内部的关系和管理制度都有了根本的变化，人事的变动也很大，急需抓紧时机，向工人、职员作调查，以便获得这些企业今昔对比的资料。否则，时过境迁，就要花费更多的劳动，甚至得不到这些材料了。

任何研究工作都应当从收集和整理第一手的资料开始。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学术水平提高着眼，应当提倡这种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这件工作，看起来是默默无闻的，是琐琐碎碎的，但是，它却是发展我国社会科学所必需进行的基础工作。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大量收集和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可以预期，不久以后，我们一定可以写出具有更高水平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来，写出具有更高水平的近百年的中国史来，写出具有更高水平的专题学术著作来。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23页。



从启新洋灰公司看民族工业的命运

——讀《启新洋灰公司史料》

王 城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三联书店出版）是一本典型调查材料。编者收集了启新董事会、启新公司的原始档案和来往函件，并对启新的工人、资本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进行了访问和调查，经过加工整理，编成此书。

这本书，辑录了从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到一九五八年，启新的前身唐山细棉土厂的建立，启新的创办、发展、没落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一共六十八年的历史。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现代工业的命运如何，它又如何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得到新生。可以这样说，启新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历程，它对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以及它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关系，都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鸦片战争以后，西洋的“船坚炮利”，刺激了清朝的统治阶级，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给了清朝统治者以严重的打击。他们认为，学习西洋制造枪炮的技术，不会超过外国侵略者，但是镇压人民的起义，则是绰绰有余的（即李鸿章所谓“若火器纯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而帝国主义也要求中国有一个对外软弱无能、对内有力“维持秩序”的政府。于是，洋务派的官僚们在“自强”的幌子下，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帮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办军事工业。启新洋灰公司，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洋务派的官僚创办的军事工业，不能孤立的存

在和发展，它需要有关的基础工业，例如军事工程的建筑，洋灰就是不可缺少的材料。这样，随着与军事工业相联系的其他工业的发展，投资人的范围也不能不相应地扩大。起先是“官办”，后来出现了“官督商办”（即官商合办）的企业。本书《创办经过》一章，可以说明这一点。

根据文件，启新的前身唐山细棉土厂的资金是由清朝军械所各局、开平矿务局和香山地主各出资二万两组成的，是官商合办的企业。从督办开平买办唐廷樞给李鸿章的禀帖里可以看到，创办这个企业的目的是“造成之士，应先尽军械所官用，提取其盈余，再行发售民间销用。”可见这个企业的创建，在娘胎里就既服务于军事工业，又具有封建性质。这体现了当时创办的现代工业的基本特征。

同当时其他许多工业一样，这个工厂由于封建的束缚和经营落后，先天不足，在一八九三年很快就夭折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外国资本夺取在中国设厂的特权，刺激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即当时的“士绅”）要求设厂自救，清政府被迫放松了对新工业的控制。因此在甲午战争后出现的“设厂运动”的浪潮中，天津道周学熙于一九〇〇年着手筹备恢复唐山细棉土厂。但不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帝国主义分子仗着八国联军入侵的机会，霸占了唐山细棉土厂。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经周学熙费了许多周折（包括英国驻北京公使及天津总领事出面干涉），终于在一九〇六年收回重办，组成启新洋灰公司。这个公司成立后，周学熙借用了北洋淮军银分所和天津官银号的公款，开工生产，生产获利之后，方



才召集股本。可見启新最初的資本是由官僚資本轉化來的。从启新股東被選為董事的名单中，也可以看到一百萬元的股本，大部分掌握在“北洋袍澤”一類人的手里（這些人到民國以後又變成總長、次長、省長、銀行總裁、經理等人物）。這又表明當時創辦現代工業的一個特點。當時，一些官僚，把辦工廠作為擴充自己經濟實力和政治資本的一種手段。收回唐山細綿土廠和創辦启新，都是在袁世凱的直接支持和參與下進行的。

启新的“創業”，既然憑借封建官僚的勢力，自然容易獲得種種的便利和特權。它在直隸、東北以及長江流域取得了優先設廠的特權；清朝的農工商部和民國初年的交通部曾飭令京奉、京張、京漢、正太、道清、滬寧等鐵路局專用启新的洋灰；清政府批准启新的洋灰“無論運至何處，只征正稅一道，值百抽五，沿途概免重征。”等等。因此启新在開辦五年之內，股本由一百萬元增至二百八十五萬元，由一個廠擴充為兩個廠，生產能力由每日七百桶增至一千二百桶，並且於一九一二年吞併了大冶水泥廠，形成了启新獨霸水泥市場的局面。這種特權，直到一九二〇年以後才逐漸消失。启新憑借特權發家，當然不是意味着封建勢力在“扶持”現代工業的發展，恰恰相反，這種封建式的壟斷，排斥一般資本家競爭，說明封建勢力對於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起着嚴重的阻礙作用。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受封建勢力的束縛，同時也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由於帝國主義忙於互相殘殺的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中國的民族工業有了一個發展的機會。從書中可以看到，水泥工業也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我國先後建立了上海華商水泥公司、南京中國水泥公司和無錫太湖水泥公司，打破了启新壟斷水泥市場的局面。然而，戰爭一結束，帝國主義又卷土重來，中國經濟本來落后，水泥市場的容量極為有限，按照資本主義的規律，這幾家水泥公司之間，不可避免地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本書《壟斷與競爭》一章說明，

華商和中國公司自一九二三年先後出貨以後，立即以跌價與启新競銷。華商地處上海，鑒於日本水泥的傾銷（在抗日戰爭前，日本水泥占進口水泥的第一位），自己首當其衝，於一九二五年又與實力雄厚的启新簽訂為期五年的聯營合同。中國水泥公司為了與启新、華商抗衡，於一九二七年收買了太湖水泥公司。以後這幾家公司為了吃掉對方，有時聯合，有時拆伙，有時三方互相火併，形成混戰，直到一九三六年，才簽訂聯營合同，一直繼續到“七七”事變。這種激烈複雜的鬥爭，固然是民族工業之間矛盾的表現，同時也表明我國民族工業在封建主義的束縛和帝國主義洋灰的傾銷下，市場有限，走投無路。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侵入我國，華北和東南沿海諸省相繼淪陷，启新實際上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走上了喪盡民族氣節與日寇合作的道路，名為私營，實為軍管企業。启新為日本帝國主義提供修築公路、港灣、飛機場和礮堡用的水泥，幫助日本侵略者屠殺自己的同胞。一九四二年以前，启新一度“生意興隆”，“造成華北銷數未有之記錄”。股東們自鳴得意地認為：“本公司營業前途之興榮蓬勃，可以操諸左券。”但抗日戰爭勝利後，启新給國民黨反動派的呈文中，却竭力為這一段不光采的歷史洗刷，說什麼一九四一年該公司之所以擴充設備，原系對日寇“表明自主自辦，戢其野心”，而且“暗中設法減低產量，以為消極抵抗之計。”更使讀者憤慨的是他們還把資敵的行為硬栽到職工身上，胡說什麼“其所以未將工廠停歇，是由于想維持職工的就業。……”你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里的一部分資本家（當然不是全部），就是這種嘴臉（據編者交代，這部分材料，已被焚毀）。

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派，本來同“資敵有據”的資本家是一家人，何況启新在內地的湖南辰溪廠和昆明廠已經和官僚資本勾上了關係，因此，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只來了一個“劫收”的下馬威，接着就把工廠發還給启新了。而启新運用依附北洋軍閥的經驗，給政學系官僚資本撥出一部分股份，并把政學系的人置於副總經理



的高位上，于是启新又有了新的靠山。可是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已处于灭亡的前夕，它进行的投靠美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政策，已使民穷财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在国内水泥市场日益过剩的情况下，还免税大肆进口美国剩余水泥，这只能置启新于死地。本书辑录启新给伪行政院、经济部、财政部等部门的呼吁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水泥厂商，危如累卵，破产之期，翘足可待”，结果是：“属会同业奔走呼号，盖已声嘶力竭，而所获结果，洋泥（作者按：即美国水泥）之源源进口也如故，各机关之购用外货也亦如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启新以“灰无销路，山穷水尽，绝对不能维持”，登报宣布停工。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工业的归宿。

启新虽然命途多舛，但资本家仍然发了大财。本书《资本积累》一章告诉我们，启新从开办到一九四七年，每百元的投资，其历年所得的股息、红利（除去通货贬值的因素），累计数达五百四十九元二角九分，超过原投资将近四倍半（其中尚未计入利用这些股息、红利进行再投资所取得的利润，和担任经理、董事一类职务的资本家的“薪金”，以及各种津贴、车马费、酬劳等），这都是工人的血汗。

启新的工人，在解放前像其他厂矿的工人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启新的工人，分里工和外工两种。里工是公司直接雇用的，依工作性质分为九牌。技术工人每日工资四、五角，普通工人只有二角二分，此外还有四、五百童工（十二、三岁），童工每天至少要工作十一小时，干采石的钻眼、击碎石块和装车等“无甚技巧”的笨重活。夜班的童工，下午七时上班，翌晨五点下班，工资一角五分。据书中有关文件记载：“如多做一点，照一点半计算”。看起来多么“公道”，实际上是惨无人道的剥削。至于外工（也叫外包工，有七百人左右），解放前不承认是公司的工人，公司把工作包给大柜（即封建大把头），大柜再把工作分给小把头，对工人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这些把头，仗着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军警宪的势力，迫害工人，还动不动威胁工人：“谁不好好干活，就把谁送到宪兵队

去。”这实际上是超经济的剥削。启新工人生活的恶化，指出下面的数字就够了：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的工资为基数，一九四七年七月的实际工资，只相当于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五。工人能生活下去吗？

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不能不激起工人的反抗和斗争。从一九二〇年洋灰棧二排六百余人第一次举行罢工起，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工人的斗争，从未停止。一九二二年启新工人有了党的领导，就从自发的斗争转入自觉地有组织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十月为了增加工资，里工和外包工九千多人举行了二十二天的罢工，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为建立红色工会的斗争和一九二九年斗倒伪公安局长郑锡钻的大胜利，以及反对黄色工会和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都是启新工运史上光荣的篇章。

本书最后一章是辑录解放后对启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史料。解放前奄奄待毙的启新，解放后得到新生。首先进行军事管制，接着帮助克服困难，然后进行民主改革（解散伪工会，成立新工会，推翻封建把头，改革不合理的制度等）。一九四九年政府对启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统购包销到公私合营，并且于一九五二年进行了“五反”斗争，工人参加了企业的管理，当家作主了。

解放后启新工人的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变。启新的社会主义改造，激发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七年提高到百分之四百一十九点六九，使生产获得飞跃的发展。书中记载的老工人李玉岭的话说得好：“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幸福。……只因有了党，才有我们的幸福生活，今后我还要争取在生产战线上多立功。”

启新的新生，是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启新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指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企业应走的道路。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本书的编者花了很大劳动，翻阅了四、五十麻袋的档案。在整理史料时，根据史料的内容分别章节编辑；在每一章之前，有简要的说明，介绍全章内容，表示编者的意见。对于某



些史料，編者还加了按語和注释，例如在《启新公司的成立》一节中，編者在按語中駁斥了帝国主义分子那森拒不交还唐山細綿土厂的“理由”。此外，还对史料中許多簡称、錯字和別字，作了校勘或注释。这都便利讀者閱讀。

感到不足的是本书偏重解放前的历史，而解放后的史料則嫌不足。在解放前的史料中，有些章节

史料不够(如《启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的章节内容单薄(如《工人运动》)。这些希望編者有机会加以补充。

科学研究工作必須掌握丰富的材料。整理资料的工作虽然大家都感到需要，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启新洋灰公司史料》这种典型調查书籍的出版，将会受到讀者的欢迎。

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沙 为 众

中国科学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經濟研究所合編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很好的资料书。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档案材料、會議记录、帳册、資本家之間的信函和訪問记录等第一手资料，揭示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民族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特点，反映出民族資本主义的命运和整个民族命运紧密联系。书中对于民族資產阶级的两面性、資本家的剝削和勞資之間的斗争、企业的經營管理和資本家家族內部矛盾等，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其中有关民族資產阶级两面性的材料，尤为具体生动。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在一九〇五年由一个与日本有相当密切关系的华侨資本家簡照南，以十万元港币資本在香港創办的。經營了几年，就由于本身力量薄弱和遭受英美烟公司竞争打击而停歇。一九〇九年又投資了九万元港币，重新复业。辛亥革命以后，人民爱国力量不断增长，人民欢迎“国貨”，該公司也由亏损轉为盈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的一段时期，帝国主义的壓力暂时放松，国内由“五四”运动开始，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阶段，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逐步进入高潮，这时期“南洋”的基础虽然远較英美烟公司为差，但由于以“国貨”为号召，获得人民支持，业务获得很大发展。一九一六年在上海設厂，接着在全国各大城市及南洋群島一带遍設分支机构，“五卅”运动期間，銷貨額达到最高峰，資本已扩充到一千五百万元，成为当时民族工业中有数的大企业。

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帝国主义压力的重新增强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压迫下，“南洋”的营业重趋下降。在民族資產阶级抛弃革命、附和大地主大資產阶级的反动的期間，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南洋”連年亏损达五百七十余万元，以至实行减少資本。一九三一年虽然轉亏为盈，但是，企业中已引进大量官僚、买办和封建势力，經營日益腐敗。資本家勾結反动統治者疯狂地殘酷压迫工人，并幻想依靠官僚資本势力重振营业。一九三七年，簡家終于不得不出让股份和自己股份的行使权，使整个企业落入宋子文官僚資本集团之手。直到全国解放，这一民族資本企业才恢复了生命。

在长达三十二年的時間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竞争的主要对手，始終是英美烟托拉斯(顧中烟



草公司)。这种情况决定了它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特别错综复杂的关系。南洋的创立和发展,对英美烟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的活动起了相当的抵制作用。它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同英美烟公司进行长期的市场斗争。在市场斗争中,“南洋”资本家采取了許多针锋相对的手段,如减价、赠奖、以一种产品抵制一种产品、一个商标顶住一个商标等等。但是,它最有力的手段,是以“推销国货、挽回利权”为号召,争取国内人民和南洋一带爱国侨胞的支持。一九一五年“南洋”将英美烟公司蛮横压迫的情况“诉诸社会”,曾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同情,“烟贩与吸家同时忿激”,使“南洋”的各牌产品的销路“同时为之猛进”。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正是靠着人民爱国力量的支持,才能在同实力远较强大的外国托拉斯进行市场斗争中取得一定成效。书中辑入的有关材料,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这些材料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经营企业的出发点是为了自身的利润,它的力量又是比较薄弱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本家,对于有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作后盾的英美烟公司的竞争和压迫,感到很大的畏惧,认为“小岂可以敌大?寡岂可以敌众?弱岂可以敌强?实为千古不易之理”。因而在许多问题上都倾向于妥协,这集中地反映在英美烟公司同“南洋”合并的问题上。英美烟公司曾先后三次提出合并方案,企图吞并“南洋”,只是由于条件没有谈妥,最后由于英美烟公司内部改变主意未曾实现。但在“南洋”的资本家中,妥协倾向是一直占着上风的。

当时,有些资本家也模糊地认识到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抗拒帝国主义压迫的有力支持,认识到自己“营业之增进,多借国货二字为号召,故得社会人心之助力,……若一旦屈降外人,纵不为社会唾骂,亦令提倡国货者灰心。而我公司营业必从此失败矣”。因此主张保持“国货”招牌,扩大招股,“合政府(指北洋政府)及国人之力与之对抗”。但是,公司主要负责的资本家则担心同英美烟公司竞争“无异与恶虎争斗,稍一疏忽,

即为吞噬”,而“若与合并,则变为通家,如孩童之得有保姆护卫,时时可处于安乐地位”。并且进一步幻想借英美烟公司的“诚意”来“扶植”自己,借英美烟公司的势力共同抵制同业,“则一盆之肉终是两人食之,岂不利益哉!”在内部争论和英美烟公司强大的压力下,前一种资本家也惶惧动摇了,终于提出:“倘以虽有外援(指‘急速筹划、添招华股’,或与北洋政府‘合作’)亦不能御之为虑,则又不若早日降之,不失为蜀之安乐公之为愈。”

本书编者精心择录的许多资料,集中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和帝国主义关系方面的两面性,还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若干方面。在资本家往来的信函中,有些表露了不同程度的民族感和爱国心。但主要负责的资本家则斥为是“过于迂腐”之论,并且认为“生意乃个人自由行动,……试问争气,争气为人所败,国人亦能争气补我损失否?”特别是他们认为“人之所能为世界社会造幸福,争国家权利、为国生光者,多是金钱”;“日本村井……与人合并……已为大富,何曾见一国人骂之,现反多人颂扬”;“总之,有钱的人敬重,无钱必为人鄙,……有大注金钱,名誉便好”。正是这种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在对帝国主义的关系上,终于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本书的编者序中指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帝国主义的“妥协与依赖是多方面的,只有与英美烟公司的市场斗争才是坚决的”。书中列举的材料充分证明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历史材料,也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官僚资本势力关系上的两面性。“南洋”的资本家对国民党政府的捐税政策也曾表示过不满,并进行过一些斗争。但是,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官僚资本集团一直存在着很多的幻想和严重的依赖关系。他们曾表示愿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创议设立的“国营烟厂”合作,以使“血本有着,公诸国家,两得其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还曾在经济上支持汪精卫、陈公博等的反动政治活动。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官僚资本集团的妥协性最



突出地表现在它同宋子文的关系方面。“南洋”的资本家长期以来就和宋系官僚资本集团有密切的联系。后来，当公司由于资本家家族内部矛盾、经营管理腐败和市场竞争失败而陷入严重的困难时，资本家幻想借宋氏集团的力量恢复和加强公司的地位，他们竟以低价让给宋氏集团股份二十一万股，并且接受宋氏集团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把简氏家族自己所保有的其余一半股份二十余万股的股权，也让宋氏集团来全部掌握。这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终于在一九三七年落入后者的魔掌，成为一个官僚资本直接控制的企业。

不断加强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绝对的、普遍的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处境困难，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受着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所支配外，还力图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来摆脱自身的困难。正因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对工人的剥削是分外残酷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情况就是如此。工人工作时间一般在十一小时以上，在产品供不应求时还经常采取加班加点办法，甚至强迫工人通宵工作；工人的工资都微薄得可怜，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工人工资在企业总收入中的比重平均只占百分之四左右，同期中的剥削率估算在百分之一千以上。

本书编者所收集的资料中，突出地表现了“南洋”的资本家所采取的关厂政策。一九二七年初，当公司销货额刚见下落时，“南洋”的资本家即关闭了香港厂，一九二九年又毅然关闭尚在获利的浦东分厂，接着把上海总厂也关掉。关厂政策，一方面说明了“南洋”的资本家不像一些小厂资本家那样留恋于勉强维持的局面，而是考虑到形势的变化，有较全面的打算。另一方面，他们的打算，却完全是企图从进一步压迫和榨取工人中找出路。香港厂的

关闭，是和当时大革命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而浦东分厂，则是南洋各厂中工人组织最好的一个，资本家在关厂前同国民党反动政府作好安排，对报馆作好联络，并且通过总厂黄色工会分化总厂工人，拒绝援助分厂工人斗争。关厂期间，“南洋”的资本家趁着生产不景气以低价委托别厂代卷香烟，更假借美商名义开设一精华制烟公司包工代制。一九三一年老厂复工，工人再进厂都作新工人对待，工资大大减低，劳动强度大大加强。事后，资本家自鸣得意地宣称：“……卒将‘容共’时期所订种种不利资方之条约一律撤销，同时又将工厂内部工会式变相之职工俱乐部……自动解散。此种成绩，大约可得到今后成本比前轻得多，出货快得多，工作紧张得多，用人少得多。”

除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外，民族资产阶级还尽量以剥削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作为增加利润的补充手段。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于其原料主要取给于农民，对农民的剥削也是严重的。南洋资本家在河南许昌、山东坊子等地与地方封建势力勾结，开办收烟场，利用预购、高利贷和压级、压磅等方式，残酷地剥削种烟农民。在许昌的收烟办法就规定“每担烟叶非额外加重二十斤不收”；还要强制烟农负担“里三分，外三分”的佣金，即每担须抽出六分作为佣金交给烟行。许昌收烟厂的“余磅”一项，在一九二〇——一九三一年间，平均占到收购量的百分之十二点三，最高时达百分之十六点三，也就是公司收购烟叶一百磅，而烟农实际要交一百一十六磅多。本书辑入了这类资本家剥削农民的材料，是同类型性质的其他书中所比较少见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一书也有缺点和不足的地方。第四编解放后的改造部分，对党的政策以及企业改造特别是人的改造的情况叙述得不够，也不全面；在编者序中把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和定息简单提作贯彻“公私兼顾”与“劳资两利”政策，是不恰



当的。有些地方对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及内幕情况表现得不够完整。例如，英美烟公司曾三次压迫“南洋”接受合并，第二次合并谈判是由英美烟公司自己取消前议而告中断，原因何在，资料未能清楚地指明。对于一九二七年以后资本家陆续关厂的原

委，一九三七年宋子文官僚资本侵入南洋的经过，材料都比较简单，不能反映出资本家的思想意图，特别是他们政治方面的考虑。对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档案材料不足，可以通过调查访问来补充。本书对于调查访问材料的收集，还是重视不够的。

私营商业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调查

——读《北京瑞蚨祥》

徐道河

《北京瑞蚨祥》，是商业企业的一本典型调查资料。这本书，叙述了北京瑞蚨祥绸缎洋货店的创办、发展、衰落和在全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

本书所包括的资料，一部分是从企业的档案中得到的，大部分是作者深入企业，亲自进行调查，直接得到的。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先后访问了工人、职员和资方代理人等几十个人，收集了大量生动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于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花过一番辛勤的劳动。

北京瑞蚨祥，是我国北方素负盛名的一家绸缎洋货店，是由山东章丘县孟家出资开设的，创办于一八九三年。

北京瑞蚨祥的前身，是鸿记布庄。鸿记布庄经营土布批发业务。当清朝皇室崇尚洋务，修造铁路，民族工商业开始出现的时候，瑞蚨祥的资本就转向零售，改营绸缎、广货、布匹。

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入侵，烧毁了北京前门外最繁华的商业区，瑞蚨祥也变成了一堆瓦砾。但是，它很快就摆设布摊子，恢复了营业。

在一九〇一年复业以后的短短十几年间，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帝国主义自顾不暇的时候，瑞蚨祥的业务，有了迅速的发展，“由一个布摊子变为一个拥有五大字号垄断一方的绸、布、皮、茶、洋货店”，跃居为北京市“全绸布业的魁首”。

这个时期，瑞蚨祥的神话般的发展，是怎样造成的呢？作者写道：“瑞蚨祥的整个发展时代，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封建军阀大混战的时期，一个劫掠的时代。四亿人民颠沛流离，家破人亡，造成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繁荣，被搜刮的人民财产集中到帝都，这就是瑞蚨祥资本积累的来源。”

瑞蚨祥一开始就同外国资本和本国统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当时，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和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都需要瑞蚨祥这样的商业企业。这就是瑞蚨祥暂时获得生命力的原因。

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我国政局十分动荡，经济日趋崩溃，瑞蚨祥终于走了下坡路。

作者指出，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都”南迁，旧一代的官僚、军阀淪落，瑞蚨祥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主要服务对象，营业额大大下降。



面临这种突然的变化，瑞蚨祥不得不改变经营方针，以遗老遗少和农村的地主、富农作为服务对象。到一九三〇年以后，瑞蚨祥的营业额又见起色。但是，它的上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年代里，瑞蚨祥不但营业不好，而且资本大大削减；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亏损日益严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几乎奄奄一息。

瑞蚨祥的发展史，是曲折的。作者写道：“从北京瑞蚨祥经历的几十年来看，虽然每个时期都有高潮起伏，但总的趋势是由小而大，又由盛而衰，形成一个抛物线。”

二

北京瑞蚨祥的特点是带有浓厚封建性。作者指出：“瑞蚨祥是一个在封建社会里开设起来的家庭企业，从里到外缠着封建的、乡土的、家族的纽带”，企业内部“几种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在许多关系上带有两重性，即有资本主义的一面，还有前资本主义的一面。”

瑞蚨祥的资本家阶级内部有两种人，一种是出资人，即东家；另一种是经理和大小头目，即掌柜。东家和掌柜之间没有封建性的契约或合同的约束，他们可以自由散伙，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一种表现。但是，掌柜大都出身于本企业的学徒，同东家有历史性的师徒关系，同时，掌柜不出资本而参加企业分红，保留着封建社会企业“人力股”的残余形式。

企业内部职工也有两种，一种是雇佣来的“自由”工资劳动者，他们来店出店，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特点。另一种是从本企业学徒中培养出来的职工，他们大都是资本家的亲属或同乡。他们同资本家除了雇佣关系外，还表现出学徒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延续。

本书用很大篇幅介绍了瑞蚨祥的学徒制。

学徒，基本上都是资本家的同籍——山东人，他们同资本家大都非亲即故。学徒进企业以前，在受资本家严格挑选、验看的时候，要向资本家“叩

头拜礼”。学徒进企业以后，要受到严厉约束。例如，一天工作十六、七小时，第一年只许站着，不许坐着；在服装上，只能穿粗布无领大褂，不能穿细布绸衣；一年中除了洗澡和两次看戏由“大师兄”领着才能出去外，平时不准出门。当资本家家里有婚丧喜庆的时候，学徒就要去听候使唤，行“弟子之礼”。学徒从事较重的劳动，而收入极微。劳累、乏味的生活，不只消蚀了学徒的朝气，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学徒由于受不了这种生活的折磨，有自动离职的，也有忍无可忍、触犯劳动制度而被开除的，也有得病死去的。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出，资本家和学徒之间这种超经济的人身依附的关系，是多么残酷！

封建性也渗透到瑞蚨祥内部各项管理制度里面。

维持瑞蚨祥资本家对企业实行封建性家长式统治的一项重要制度——“铺规”，约束着瑞蚨祥每个职工的生活行动自由。从本书列举的“铺规”条文中可以看出，“铺规”，不仅束缚职工在营业时间内的活动，而且规定职工在业余时间不能自由外出，不得在外过宿；职工参加政治活动，当然更不允许。触犯“铺规”，要受惩罚，甚至开除出店。因此，广大职工除了一年一次探亲外，整年过着禁闭式的生活。

瑞蚨祥由于带有浓厚封建性，因而也就处处显出它的保守性。作者在本书的开头几页，就饶有风趣地描述了瑞蚨祥资本家孟洛川的一股保守劲，他反对一切新鲜事物，害怕革新，总想照老样子办事。

封建和保守的经营方式，在开始还多少适合于当时的北京社会。例如，瑞蚨祥不强调资金周转，而强调囤积货物，重视进货，从来不登报或贴广告，更不搞折扣、赠奖一套手法。这些做法曾经表现了瑞蚨祥的经营特点，赢得了“货真价实”的声誉。但是，这些经营特点，经不起外国资本的竞争。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北京时期，瑞蚨祥原来的经营方式就站不住脚了，它的经营特点也消失殆尽。



三

解放后，北京瑞蚨祥从资本主义商业企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商业企业。这本书，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叙述了这家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料。本书的下篇，包括私营时期的资料和公私合营时期的资料。书中对每个时期，都详细地叙述了当时业务经营的变化、企业的内部改革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多次地得到党和国家在各方面的帮助，因而有了恢复和适当发展。北京瑞蚨祥也不例外。一九五〇年五月，国家调整工商业，在税收、贷款、公私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时，北京瑞蚨祥职工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团结资方人员，改变经营方针和方法，使企业面向工农群众。由于经营方针和方法的改变，营业有了显著的好转。这家商业企业的东西两店营业额由每天平均四、五百元上升到一、二千元。

北京瑞蚨祥同其他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一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当它的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后，它就乘机占用工业资金，抢购物资，同国营商业争夺市场，打击私营同业，谋取暴利，进行投机违法活动。根据瑞蚨祥资方负责人在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中自报：他们行贿二十三笔，盗窃国家资财四笔，偷工减料五十一笔，获取暴利六十二笔，偷税漏税就更多了。

一九五二年，党和国家发动广大职工群众进行了“五反”运动。这是一次尖锐的严重的阶级斗争。通过“五反”运动，瑞蚨祥的职工检举了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揭露了工人中的蜕化分子和资本家组成的非法小集团，打退了资本家的进攻，并且建立了对企业的监督。

一九五三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瑞蚨祥申请公私合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经过政府批准，便成为一个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成分的

公私合营的商业企业。

瑞蚨祥接受公私合营，从总的方面来看，是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势所迫。同时，它本身也有某些有利因素。首先，瑞蚨祥企业规模较大，从业人员较多，党政领导部门一向对它掌握较紧，企业内部的党、团和工会组织也比较健全。企业经过一系列的经营活动的改革，已经为公私合营创造了条件；其次，瑞蚨祥的在职资方都是资本家代理人，他们本身对所有制改变的顾虑小些，他们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不能不感到老日子是不会再来了，目前的日子也很难维持下去。

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是根本性质的改造。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充满了复杂曲折的阶级斗争。这本书对这个过程叙述得是比较详细的。它从私营时期的企业内部改革和店员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写起，叙述了个别企业公私合营的经过、合营后的企业改革和优越性，叙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的企业改革，并且以不少的篇幅，叙述了公私合营过程中和合营以后店员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作者写道：“在这期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斗争，只是多半是更加曲折隐蔽了，用工人群众的话说，资本家现在是‘打太极拳’了”。

在我国目前出版的经济学资料书里，像《北京瑞蚨祥》这样反映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书，还是很少的。从这本书里，不仅可以研究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民族资本的特点，而且可以研究北京瑞蚨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党和国家发动职工群众所进行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这对于研究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帮助的。

《北京瑞蚨祥》是一本比较好的典型调查资料。缺点是对资料的选择和安排还有些重复的地方。如果把有些资料加以提炼，看起来眉目可能更清楚些。同时，希望在再版时，能把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新特点，加以概括，那就会更好。



实用主义經驗論的主觀唯心主义实质

汝 信

关于經驗的問題是認識論的重要問題之一。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圍繞着經驗問題始終貫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对立路綫的斗争。在資本主义上升时期，某些先进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例如十七、八世紀的英、法唯物主义者，反映着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新兴資產階級的要求，能够主张对經驗作唯物的解释；而在資本主义进入了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情况就起了根本的变化。現代資產階級哲学家，都投入唯心主义的怀抱，用各种手段来欺騙群众，借以维护他們的反动的階級利益。現代資產階級哲学流派，从数十年前被列宁批判得体无完肤的馬赫主义，到目前还在泛濫流行的邏輯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唯心地解释經驗，其中尤以实用主义哲学的經驗論最富欺騙性与蠱惑性，影响較大。

实用主义者对經驗的理解，在实质上并没有超出以往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者关于經驗的基本看法，只是采用了新的更迷惑人的形式而已。

从历史上看，对經驗的不同的解释造成了經驗論学派的分裂。大家知道，近代經驗論的創始人是杰出的英国唯物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他同脱离实际、蔑視經驗的传统的經院哲学进行斗争，大力提倡尊重經驗，以經驗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并且对經驗作了唯物的解释。在他看来，經驗是一切知識的真正源泉。他坚持知識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原理，认为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而人們对于自然界的認識則是第二性的。用他的話來說，知識是存在的映象。“人們若非想着发狂，一切自然底知識都应当求之于感官”^①。

培根的后继者洛克，基本上坚持了对經驗的唯物的解释，但有时却向唯心主义动摇。洛克认为，人們的全部知識都建立在經驗之上，但經驗可分两种，即外部經驗（感觉）和內部經驗（反省）。一方面他承认客观物质世界是外部經驗的来源，认为“知觉是由刺激我們感官的一些外界原因給我們所产生的”，經驗的获得是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人如果不到产波罗蜜的东印度群島亲自尝尝它，則他便不会得到那种滋味”^②。另一方面，他却认为“內部經驗”只是我們的心灵活动，它“和外物毫无关系”，观念“是不能从外面取得的”。这样，他就承

① 《新工具》，商务印书館版，第22頁。

② 《人类理解論》，商务印书館1959年版，第628頁。



认某种經驗可以不依赖于外部世界而独立存在，从而为唯心主义者曲解經驗敞开了方便之門。

由于洛克哲学的这种内在矛盾，以后唯心的和唯物的經驗論者都利用了他的学說。前者的代表是英国主观唯心主义者貝克莱，后者的代表是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列宁說：“貝克莱和狄德罗都淵源于洛克。……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綫走向唯我論（“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綫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①

貝克莱认为，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无非是观念或感觉的集合，“它們的存在（esse）就是被感知（Percipi），它們不可能在心灵或感知它們的能思維的东西以外有任何存在。”^②由于貝克莱根本不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他也就否认經驗的客观来源。在他看来，經驗的来源只在主体内部，“观念的原因是一个无形体的、能动的实体或‘精神’”^③，經驗的內容也純粹是主观的，感觉經驗“創造出”外部世界的一切。貝克莱对經驗所作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解释，在历史上起了深远的恶劣影响，以后唯心主义經驗論者的种种“新理論”，都沒有脱离貝克莱的窠臼。

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則清除了洛克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因素，抛弃了洛克关于内部經驗的理論，把物质世界看做經驗的唯一来源。他們指責貝克莱把整个物质世界归结为主观感觉的做法，乃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他們认为，我們的一切經驗都是通过外物作用于感官而获得的，經驗的內容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他們把

經驗叫做認識的“指路杖”，就是因为經驗反映着客观世界的性质，只有凭借經驗才能揭露自然的秘奥。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使古典的唯物主义者和古典的唯心主义者划分开的对經驗的不同解释，其根本关键在于是否承认經驗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否承认不依赖于經驗的自然界、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唯物主义者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它在任何人类經驗产生之前早就独立存在着，而經驗則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它是“某种客观的、人从外界得到的东西”^④，是外部世界的或多或少正确的反映或映象。相反，唯心主义者則认为，我們的經驗是我們所知道的唯一实在，外部世界或者只是經驗的形式，只存在于經驗之中，或者根本无法知道它是否存在。他們竭力否认經驗的客观源泉，把經驗說成是純粹主观的东西。

以往的哲学史說明，要确定一个哲学家在認識論方面所持的立場，不仅要看他是否承认經驗对認識的作用，而且首先要看他怎样去解释經驗。我們在評判实用主义者的哲学的时候，重要的也在于透过他們关于經驗的高談闊論去认清他們所談的經驗的实质。

“經驗”是实用主义者最喜欢玩弄的一个哲学概念，他們一向以“經驗”为标榜，自詡“尊重”經驗，借以給自己披上一件骗人的“科学性”的外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奠

①④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4、151頁。

②③ 《人类知識原理》。《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43、347頁。



基人之一威廉·詹姆斯，就宣称他的哲学从經驗出发，以經驗作为認識的源泉，并认为过去的經驗論哲学都不够“彻底”，而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彻底的經驗論”。另一个美国实用主义的魁首杜威，则把他的工具主义称为从經驗中产生并以經驗为依据的經驗論哲学，并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将經驗的可能加以合理化，尤其是集体的人类經驗的合理化”^①。实用主义者这样喜欢談論經驗，主要是因为他們企图利用經驗这个概念进行詭辯，掩飾他們的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照实用主义者說来，以往經驗論哲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就是把經驗这个概念的范围限制得过分狭小。他們則把經驗的范围无限扩大，使之包罗万象，涵盖一切。实用主义者对經驗的解释是混乱而不一貫的，他們所謂的經驗并不局限于通常所說的感觉經驗，而包括人的一切主观意識状态和心理體驗，甚至連梦幻、胡思乱想、魔法、迷信等等最荒誕不經的东西都包括在內。有时他們对經驗作生物学的解释，把它看做有机体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結果，說什么經驗是由人的行动和对行动結果的感受这二者的密切关系所形成的。有时他們却又竭力強調經驗本身不是主观的，是不依賴于主体的。由于实用主义者所說的經驗的含义极其模糊不清又极其广泛，就使他們得以随机应变，根据主观需要对經驗作出各种随心所欲的解释。

实际上，实用主义者所以要利用經驗来大做文章，其真实目的在于用比較隱蔽的方

式来同唯物主义进行斗争，鼓吹唯心主义。但是，在表面上实用主义者却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伪装“中立”，似乎采取“超然”的态度。他們詭称已經找到了“永远結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的第三条路綫，从实用主义的观点看来，仿佛这一有关哲学基本問題的爭論根本就是多余的。杜威是鼓吹走所謂“第三条路綫”最力的一个，他胡說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用所謂“非經驗的方法”把主体和客体、心和物、經驗和自然割裂开的結果，只要采用他的“經驗的方法”，把經驗当做原初的存在，确立起統一的經驗整体，使心和物都从属于經驗，把它們看作从經驗整体中派生出来的东西，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的“陈旧的对立”。

实用主义者的这种拙劣的伎俩完全是徒劳的。哲学的根本問題是任何一个哲学家所抹煞不了的，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第三条路綫”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列宁早就說过：用“經驗”这个字眼可以消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的对立的那种濫調，完全是神話。只要剝去实用主义的“中立”的伪装，它的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本来面目也就暴露无遺了。

实用主义者企图迴避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問題，把經驗抬高为凌駕于物质和精神之上的最基本的东西。实用主义者对經驗的基本看法，就是把經驗作为第一性的东

^① 《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館1958年版，第66頁。



西，归根結蒂把整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歸結為經驗。詹姆斯認為，思想和事物是由同一素材所構成的，“世界上只有唯一的原始的素材或材料，一切東西都是由它所組成的，我們把它稱為‘純粹經驗’”^①。在他看來，所謂“純粹經驗”是原始的渾沌的整體，整個的經驗是“自足的”，不依賴於現實世界，它本身就是唯一真正的實在，“經驗和實在歸結為同一個東西”。換句話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無非都是經驗。英國實用主義的代表費迪南·席勒就公然宣稱，“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整個世界就是經驗，世界無非是由經驗所構成的”^②。

實用主義者的這種經驗觀充分說明他們自己所吹噓的所謂“中立”態度，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在對待經驗和客觀物質世界的關係問題上，實用主義者承襲了過去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的立場。

貝克萊曾經為自己提出過徹底“消滅”物質的任務。實用主義者也同樣致力於“消滅”客觀物質世界。詹姆斯就公開贊同貝克萊對物質概念的“駁斥”，並且承認自己所維護的概念只是貫徹地推行了貝克萊等人首先採用過的“實用主義”方法^③。在他看來，世界是從主體的經驗中“製造”出來的。他說：“我們把什麼東西稱為事物呢？看來這是完全隨我們的便，因為我們根據我們人的目的去劃分一切事物，正如我們劃分出星座一樣……我們隨我們的心意把感性實在之流分為各種事物。”^④ 總之，最初存在的是“經驗流”或“意識流”，這個連續的“經驗流”被人根據需要人為地劃分，才從其中分化出被稱之為物

的個別凝結物。席勒的觀點和詹姆斯也很有類似之處，他把整個世界說成是我們用“無形式的原料”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作成什麼，它就是什麼”，因此他認為談論離開我們而獨立的世界是毫無意義的^⑤。從這種實用主義的觀點看來，人的認識過程就成為“創造”實在的過程，實在世界不是被人認識，而是被人“創造”出來。這當然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而且這種從經驗中随心所欲地“創造”出世界的實用主義學說，還是露骨的反動的唯意志論。

實用主義者杜威為了掩飾這種露骨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採用了更狡黠的手法。他千方百計地使他對經驗的解釋具有更多的“客觀性”的外貌，口頭上也提出要反對主觀主義地解釋經驗，甚至还對貝克萊作了一些不關痛癢的批評。他聲稱自己並不否認外部世界的存在，斷定說“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我們從來都不懷疑世界的存在，為了不自相矛盾，我們也不能這樣做”^⑥。但是，問題的關鍵卻不在於是否承認外部世界的存在，而在於是否承認外部世界不依賴於經驗而獨立存在。正是在後面這一點上，杜威和其他實

① 《徹底的經驗主義論文集》，紐約1912年英文版，第4頁。

②⑤ 《個人的唯心主義》，倫敦1902年英文版，第51、60頁。

③ 參閱《實用主義》，倫敦1908年英文版，第89—90頁；《徹底的經驗主義論文集》，第10頁。

④ 《實用主義》，第253—254頁。

⑥ 《實驗邏輯論文集》，芝加哥1916年英文版，第302頁。



用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

杜威不像詹姆斯那样把經驗看作單純的意識状态、“經驗流”，他所強調的是“經驗和自然的連續性原理”。所謂“連續性原理”，就是把經驗解釋成不依賴于主体的客觀的東西，把經驗和自然、主体和客体、意識和周圍現實聯繫起來，融而為一，使經驗成為一個兼收并蓄的整體。

杜威所謂的經驗，不僅包括我們一般所說的主体的經驗，而且包括一切經驗的主体和被經驗的對象。他在《經驗与自然》一書里這樣寫道：“‘經驗’是一個詹姆斯所謂具有兩套意義的字眼。好像它的同類語生活和歷史一樣，它不僅包括人們作些什麼和遭遇些什麼，他們追求些什麼，愛些什麼，相信和堅持些什麼，而且也包括人們是怎樣活動和怎樣受到反響的，他們怎樣操作和遭遇，他們怎樣渴望和享受，以及他們觀看、信仰和想像的方式——簡言之，能經驗的過程。‘經驗’指開墾過的土地，種下的種籽，收穫的果實以及日夜、春秋、干濕、冷熱等等變化，這些為人們所觀察、畏懼、渴望的東西；它也指這個種植和收割、工作和欣快、希望、畏懼、計劃、求助于魔法或化學、垂頭喪氣或歡欣鼓舞的人。”^①

杜威這樣把經驗概念無限擴大，也就把整個客觀物質世界都消融于經驗之中了，因此他的“連續性原理”實質上並不是闡明經驗與自然的聯繫，而是用經驗去吞并自然。

杜威的這一套謬論其實也并不新鮮，它無非就是馬赫主義者的“原則同格論”的再

版。在杜威看來，經驗是原始的統一整體，主体和客体仿佛是从經驗中派生出來的，兩者不可在原則上分離，沒有主体就沒有客体，甚至主体和客體的區別也只是“為了經驗內部的一定目的而確立的某種區別”^②。所有這些見解幾乎都可以在馬赫主義者阿芬那留斯那里找到。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從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來，馬赫主義和實用主義之間的差別，就像經驗批判主義和經驗一元論之間的差別一樣，是微不足道的和極不重要的。”^③

從上述可以看出，實用主義的經驗論基本上是遵循着貝克萊——馬赫的主觀唯心主義路線發展的。貝克萊把一切說成感覺，存在就是被感知；實用主義者則把一切說成經驗，存在就是被經驗。不管實用主義者使用多少漂亮的詞藻，他們的基本思想總沒有跳出貝克萊主義的圈子。

對經驗的實用主義的解釋，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唯我論。如果按照實用主義者的說法，整個世界都可以被歸結為經驗，那就自然而然地會產生這里究竟說的是誰的經驗的問題。詹姆斯和杜威都力圖逃避唯我論的結論，把經驗硬說成某種不屬於任何人的客觀獨立存在的東西。但是，這種狡辯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知道，當我們說經驗的時候，總是指人的經驗，不依賴于人的經驗是不能想像的。只要實用主義者

① 《經驗与自然》，商務印書館 1960 年版，第 10 頁。

② 《人的問題》，紐約 1946 年英文版，第 396 頁。

③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 14 卷，第 361 頁。



坚持把世界說成經驗，那在邏輯上就必然會得出世界的存在依賴于人、在人出現以前沒有世界的荒謬結論。實用主義者席勒就坦率地承認世界就是“我的經驗”，認為“唯我論對經驗的解釋既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在理論上錯誤的”^①。

實用主義的經驗論還公然為僧侶主義服務，賣力地為宗教辯護。詹姆斯就專門寫過一部有關“宗教經驗”的書，企圖為宗教尋找“心理學的”根據，證明宗教經驗和人的任何其他生活經驗和科學經驗一樣是現實的。杜威也把宗教看做獨立於美學、科學、道德、政治以外的一種經驗，鼓吹使宗教在“人的經驗的每一方面都占有其自然的地位”^②。列寧曾經深刻地指出，實用主義者從經驗中順利地推演出上帝，是為了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實踐的目的。這就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實用主義作為壟斷資產階級的哲學體系利用宗教來欺騙和麻醉人民的本質。

這樣看來，實用主義者雖然也像列寧所說的資產階級冒牌學者那樣，企圖用新名詞或“愚蠢的無党性”去掩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的實質，但實際上他們卻站在唯心主義的營壘中向唯物主義猖狂進攻，鼓吹著一種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論，最後則走向唯我論並公然投入了宗教的懷抱。這又一次確鑿不移地證明了列寧所指出的——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即“唯心主義不過是信仰主義的一種精巧圓滑的形態”^③。

實用主義者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論，是他們的整個哲學學說的基础。他們把這種

理論應用於各个方面，從而得出了一系列反動的結論。

實用主義者的認識論是建立在他們的經驗觀之上的。由於他們否認有經驗以外的實在，所以在他們看來，認識不能涉及獨立於我們經驗以外的東西，而只能發生在“經驗的組織內部”，無論是認識者或認識的對象都只是經驗的部分。在這方面杜威的觀點很可以說明問題。杜威把經驗分為兩類，即非認知的經驗和認知的經驗，人的認識就是這兩種經驗之間的關係。非認知的經驗指的是原始的經驗整體，它是粗糙的、不確定的、充滿偶然性的。人的認識的作用就是通過反省思考把這種原始的經驗從混亂模糊的東西變為“明朗、確切和一致的東西”，使之符合我們的主觀需要。這就是他所謂的認知的經驗。在杜威看來，也只有這樣被經驗到的東西才是真正的認識的對象。因此，根據這種實用主義觀點，人的認識並不是人的意識對於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過程，而只是經驗內部的關係，認識的對象則完全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產物。這樣，實用主義者對認識所採取的露骨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實際上也就根本取消了人如何認識周圍世界的問題。

在認識論上，實用主義者是爬行的經驗論者。他們變本加厲地加深了和發展了歷史

① 《人本主義研究》，倫敦1907年英文版，第473頁。

② 參閱《一個普通的信仰》，耶魯大學1934年英文版，第57頁。

③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第379頁。



上的經驗論學派的錯誤，片面夸大經驗的作用，而對理論、科學思維則表現了極端的蔑視。他們根本否認事物有現象和本質的區別，認為一切事件作為經驗的事實都具有同等的意義，因此他們也就不承認認識必須經歷由表及里、由現象到本質的發展過程，不承認經驗必須上升到理論，感性認識必須能動地飛躍到理性認識。照他們說來，事物怎樣在經驗中被感知，它們也就是怎樣，因此不需要對經驗材料進行概括，從個別提高到一般，而只需要把經驗事實記述下來。杜威就公開主張排除掉理性而代之以“智慧”，而所謂“智慧”則是指為了新目的去使用過去的經驗所產生的提示，也就是利用舊經驗去取得新經驗以改造經驗本身。在他看來，人生就像一場賭博，世界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不可思議的存在，因此想依靠理性去認識世界是徒勞無益的，唯一可行的只是用經驗主義的方法去尋找應付和改善每一個境遇的手段。

由於實用主義者否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存在，因而也就根本取消了反映客觀世界的內在本质聯系和認識客觀規律的可能性。實用主義者口頭上也大談科學和理論的必要性。但是，在他們看來，這些東西的作用完全不在於使人們更深刻地認識世界及其規律，而只在於充當人們應付環境、達到一定目的的工具。詹姆斯曾經提出過“理論是工具”的說法^①，而杜威則進一步把它發展成為“工具主義”。實用主義者完全否認科學和理論所反映的客觀內容，只承認它們充當工具而發生“功效”。杜威說：“我們稱為科學的

東西，就只是發明和調整用以對個別經驗現象發生功效的工具。”^② 總之，科學和理論都只是人們為了達到一定目的而設定的方便假設，它們本身並沒有客觀的、普遍的意義。在實用主義者手里，科學和理論失去了任何認識的作用，而墮落成為他們為了追求特定的目的而隨心所欲地運用的工具。

實用主義者的真理觀也和他們的經驗觀有着緊密的聯系。實用主義者既然取消了不依賴於意識的客觀世界的存在，也就根本否認真理是客觀現實在人們意識中的正確反映。他們認為，所謂真理並不是指經驗與經驗以外的某種東西的符合，而永遠是經驗內部的事。真理意味著經驗的各個部分之間的令人滿意的“圓滿的關係”，任何觀念只要能確實有效地幫助我們和我們經驗的其他部分圓滿地聯結起來，它就是真的。因此，真理只不過是在經驗中確定的有效驗的東西。杜威在闡明“實用主義的真理觀”時這樣說道：“所謂‘真理’是一個抽象名詞，它可以應用於各種情況：實際的、預見的或希望的，只要它們在效驗和結果方面得到證實。”^③ 簡言之，在實用主義者看來，“真理”就是對人有用的東西，“效用”是衡量真理的尺度。如果宗教對人有用，它也就在這種適用的限度內合乎真理。因此，真理完全是主觀的，它只不過是人為了達到一定目的而使用的權宜手段。這樣，實用主義者在實踐上就把自己的

徐

① 《實用主義》，第 53 頁。

② 《人的問題》，第 218 頁。

③ 參閱《哲學的改造》，第 84 頁。



主观經驗和效用奉为准则，完全不顾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根本否认客观真理和真理的客观标准，鼓吹露骨的相对主义和唯意志论，并且肆无忌惮地进行诡辩。

实用主义者还用他們的經驗論学說去论证和宣扬他們的反动的社会政治观点。在他們看来，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从而根据对社会规律的科学认识去改造社会也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因此，他們詆毁革命，主张采用所謂“自由实验的方法”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他們美化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专政，吹嘘资产阶级民主，仿佛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才能通过不断的实验而使經驗逐渐得到发展和改善。用杜威的話來說，“民主就是相信人类經驗能够产生目的和使經驗借以进一步增长和丰富起来的方法”，“民主的永恒的任务就是創造更为自由和更合人情的經驗”^①，至于說的是什麼人的經驗、什麼样的經驗，那是杜威所置之不論的，反正只要保证各个人的經驗可以得到自由发展就行了。因此，根据这种反动的謬論，工人可以“自由地”得到被剝削和被压迫的經驗、黑人可以“自由地”得到受歧視和受虐待的經驗。資本家可以“自由地”得到剝削人和压迫人的經驗。所有这些都是完全符合杜威所推崇的美国式的“民主”的。不言而喻，杜威所謂在美国的現存社会制度下去創造“更为自由和更合人情的經驗”云云，只能意味着对劳动人民的莫大欺騙，并且为垄断集团的血腥統治塗脂抹粉。

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哲学，长期以来

它一直充当美国的官方哲学，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寵儿。这并不是偶然的。实用主义这种典型的市儈哲学，完全迎合着沒落的、垂死掙扎的资产阶级对生活的反动观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的必然性，反动的资产阶级不敢正视这无情的现实，他們力图否认客观规律，用自己主观的經驗去解释世界。他們也无力去正确地認識世界并根据这种認識去进行活动，而只能按照自己主观的要求去观察社会、应付环境或从事冒险，并以主观的效驗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經驗論，正好适合帝国主义时代反动资产阶级的需要，也适合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現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成为他們与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之一。

今天在經驗这个問題上，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和形形色色的現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包括現代修正主义的哲学思想)进行尖锐的斗争。歪曲解释經驗这一概念，利用它来反对辯证唯物主义，这是現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們所慣用的伎倆。正如列宁所說，“目前，各色各样的教授哲学都以侈談‘經驗’来掩飾他們的反动性。”^②因此，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論，揭露和批判現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对經驗的种种曲解，是很有必要的。

① 《創造性的民主是我們当前的任务》。《杜威八十誕辰紀念文集》，紐約1940年英文版，第227、228頁。

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50頁。

